

城市建設與圖像表達： 以 1766 年臺灣知府蔣允焄《東瀛紀典》為例*

陳冠妃**

摘要

本文以十八世紀臺灣府城作為具體個案，討論在府縣城這樣的地方行政城市，於城內辛勤工作的清朝各級文武官員如何布置其工作場所。除了建立與調整能滿足其行政、防衛、交通和經濟需要的空間結構外，官員在城市中建設最醒目的建築，往往是官祀、官學、城門等國家禮儀的展演空間，這些官方的儀式建築也就形成今日對清代臺南城市樣貌的基本印象。透過臺灣知府蔣允焄於乾隆 31 年(1766)刊印的《東瀛紀典》，有助於在宮廷檔案與地方志之外，看見地方官對於府城作為行政與禮儀空間的經營、理念及行動。

本文首先梳理蔣允焄的仕宦經歷及其在臺南的形象，並探討《東瀛紀典》的成書過程、內容特色與時代意義；蔣元樞的知名作品《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在圖、說並陳的結構形式上應是受到蔣允焄《東瀛紀典》的影響。其次，本文認為十八世紀是形塑清代臺南城市面貌最重要的時期，其中蔣允焄和蔣元樞的貢獻最大，其所建設的各式建築不僅表現官員自身的選擇與意志，也對府城紳商和地方社會產生實質的影響與意義。最後，透過《東瀛紀典》與《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等材料，分析十八世紀任職於帝國邊疆行政中心的地方官員如何以圖像及文字表達其認知中官方行政及禮儀空間的理想樣貌，進而影響了今日吾人對清代臺南歷史空間的認識。

關鍵詞：蔣允焄、東瀛紀典、地方治理、城市建築、祀典空間

* 本文的開展要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陳宗仁副研究員帶領筆者解讀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9 年 5 月 17 日國立成功大學「府城深耕五十年、成就世界續百年：成功大學 2019 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與談人國立台灣文學館蘇碩斌館長和與會學者林玉茹、李文良、賴麗娟等教授的指正。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悉心而詳盡的建議，讓筆者受益良多。撰寫過程中，得謝國興、林欣宜、林宛儒等師友惠予寶貴意見；並蒙日本東京女子大學退休教授栗原純先生惠賜《東瀛紀典》複印件，謹致謝忱。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來稿日期：2019 年 9 月 9 日；通過刊登：2019 年 12 月 30 日。

- 一、前言
- 二、蔣允焄與臺南
- 三、《東瀛紀典》的內容特色
- 四、地方治理與圖像表達
- 五、地方官的空間經營
- 六、結論

一、前言

臺南的清領時期長達 212 年（1683-1895），而且一直是府、縣級行政機關所在地，至少到光緒元年（1875）臺灣北部新設臺北府以前將近兩百年期間，位於臺南的臺灣府治都算是支配全臺的行政管理中心，臺灣道、府、縣、鎮等文武衙門皆曾設於其中。¹ 但目前有關清代臺南的有形文化資產，是以寺廟、城牆與城門為保存與展示的核心，而不見清代的衙署建築。這固然是因為在日治時期，衙署建築就已遭到拆毀，但即使在清代，有關「廟」與「城」的描述與圖像也比作為辦公處所的衙門豐富。

既然「廟」與「城」是清代臺南建築的代表，這可能就呈現了清代城市某種建設或行政管理的邏輯。以祀典武廟、大天后宮和孔廟為代表的清代古蹟，其肇建者都是官員，這些建築作為「官祀」或「官學」空間在歷史上發揮著作用。城池不僅是在朝廷允許下，由官員主持建置的防禦設施，其方位同時蘊含了五行、風水的意義，是官員舉行祭典需考慮的座標。² 這些建築共同的特色，是它們都是

¹ 光緒元年在臺灣北部新設臺北府，打破臺灣府為全臺首府的局勢，光緒 11 年臺灣建省，隨著臺灣中北部地位的提昇，作為臺灣省會的「臺灣府」府治北遷至今臺中，作為臺灣政治中心的臺南則改為「臺南府」之府治，轄下的臺灣縣也改名安平縣。在十八世紀，府城內不僅有臺灣知府與知縣的辦公處所，也是道臺衙門與御史衙門的所在地，甚至駐守臺灣的軍事核心——臺灣鎮營盤與總兵衙門也設於城內。

² 有關風水對清代臺灣公共建築在擇址與構局上的影響及意義，洪健榮有非常全面而詳細的討論，參見

國家「禮儀」的展演空間。帝國官僚與知識分子亦透過《欽定大清會典》（以下簡稱《清會典》）與地方志的編纂，說明禮儀與建築空間之間的關聯與實踐方式。³

本文將把焦點放在官僚的層次，討論在府縣城這樣的地方行政城市，於城內辛勤工作的清朝各級文武官員如何布置其工作場所？除了建立、調整能滿足其行政、防衛、交通和經濟需要的空間結構外，官員在城市中建設最醒目的建築，往往是官祀、官學、城門等國家禮儀的展演空間，這些官方的儀式建築也就形成今日對清代臺南城市樣貌的基本印象。

在橫跨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清代歷史中，又以十八世紀的臺灣官員留下特別多文獻紀錄，百年間累積了多達三個版本的《臺灣府志》和兩個版本的《臺灣縣志》，⁴加上碑刻資料，都有助我們認識地方官對於府城作為一個行政與禮儀空間的經營、理念及行動，但若是欲瞭解官方建築具體的空間及樣式，就相當仰賴圖像資料。目前已知的圖像材料包括以全臺為範圍的各版本〈臺灣輿圖〉、〈紫線番界圖〉、〈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等輿圖，以及方志附加的輿圖，另有數幅以臺灣府城為主題的皮革畫，⁵但這些圖像對建築的畫法多半是象徵性、符號性的描繪，除了《臺灣縣志》附的「縣署圖」、「學宮圖」之外，對於各建築的內部空間並沒有太多著墨，建築史學者傅朝卿即批評這些文字記載及圖像「在建築形貌

洪健榮，《龍滄渡海：清代臺灣社會的風水習俗》（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林開世以清代噶瑪蘭的築城為例，認為不能只是把風水當成文本現象，而應該視為人們對空間的實踐，即使在官方築城時，也會盡量接受各地的風俗習慣與文化差異，想辦法將它們納進一個階層性框架來馴服。參見林開世，〈風水作為一種空間的實踐〉，《臺灣人類學刊》（臺北）5:2（2007年12月），頁96-98。

³ 林開世、洪健榮、李文良等學者對方志之於帝國體制的形塑有精彩的討論，洪健榮特別指出了方志的祀典門類不僅表彰了皇朝正統禮制，說明官定壇廟祠寺的建置地點、空間、沿革、祭儀之外，亦起了整編本地祠廟民俗納入祀典體制的作用。參見洪健榮，〈崇德報功與神道設教：清代臺灣方志祀典門類的知識建構〉，《臺灣文獻》（南投）68:2（2017年6月），頁1-58；林開世，〈方志的呈現與再現：以《噶瑪蘭廳志》為例〉，《新史學》（臺北）18:2（2007年6月），頁1-60；李文良，〈清代臺灣方志的分野、山脈書寫與帝國意識形態〉，收於黃永豪、蔡志祥、謝曉輝主編，《邊陲社會與國家建構》（新北：稻鄉出版社，2017），頁361-391。

⁴ 十八世紀所編纂的三個版本《臺灣府志》有：乾隆5年（1740）臺灣道劉良璧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乾隆10年（1745）巡臺御史六十七與范咸修《重修臺灣府志》及乾隆25-27年（1760-1762）知府余文儀修《續修臺灣府志》。《臺灣縣志》兩個版本有：康熙59年（1720）知縣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乾隆17年（1752）知縣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纂《重修臺灣縣志》。

⁵ 如〈康熙臺灣輿圖〉（彩繪絹本，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藏）；〈臺灣地里圖〉（彩繪絹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雍正朝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彩繪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臺灣府城圖繪〉（皮革彩繪本，美國西雅圖藝術博物館藏）；〈臺灣田園分別禁墾圖說（紫線番界圖）〉（彩繪本，北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侯氏家族藏）等。

及規制往往不夠具體，且所附的圖像也過於簡略，在建築研究上的幫助往往是止於創建年代的釐清」。⁶ 相較之下，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臺灣知府蔣元樞（1775-1777年任）編製之《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內含39幅圖像，則以豐富而精細的建築圖面填補了空間及建築史料的缺口。

無獨有偶，同樣在十八世紀，蔣元樞來臺的12年前，也有一位姓蔣的知府蔣允焄（1763-1766年任），為自己在這個城市的建設編製了一冊《東瀛紀典》，內含18幅圖及16篇碑文。戰後以來，這本書既不在臺灣各公立圖書館或博物館的收藏中，也未曾被引用，長期在臺灣研究中缺席。筆者在東京都立圖書館找到的這部《東瀛紀典》不僅是圖文並陳、有頭有尾的完整著作，且其編輯是由作者親自為之，非假手他人，對於我們了解十八世紀臺灣官員如何自我表述其政績行為有莫大的幫助。

過去對於清代臺灣地方官員的研究，以劉銘傳、劉璈、沈葆楨等人的研究最為經典，其個人事蹟被視為十九世紀臺灣建省及早期現代化過程的縮影。⁷ 其他尚有關於施琅、陳璘、姚瑩、楊廷理、陳星聚、曹瑾等官員的研究，但在討論府縣官的施政時，多藉考察其事蹟賦予「循吏」的評價，缺乏從制度或思想的面向探討官員的行動從何而來。⁸ 有關十八世紀府級官僚的地方施政，陳宗仁以《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分析蔣元樞所欲彰顯的政績，並援引地方志的定義與邏輯分析蔣元樞的作法來由，是本文相當重要的參考。⁹

⁶ 傅朝卿，〈從臺灣相關方志與《重修臺灣郡城圖說》探討研究臺灣清代寺廟建築的幾個線索〉，收於傅朝卿，《讀史·寫史·論史：傅朝卿建築史與文化遺產論文選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2017），頁48。

⁷ 關於劉銘傳與沈葆楨的研究多是在對外戰爭、自強新政及中國近代化的脈絡下提出；有關劉璈則特別討論晚清政爭和臺灣建省的問題。參見許雪姬，〈二劉之爭與晚清臺灣政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14（1985年6月），頁127-161；蘇同炳，〈劉璈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龐百騰（David Pong）著、陳俱譯，《沈葆楨評傳：中國近代化的嘗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⁸ 如黃秀政，〈清代臺灣循吏：陳璘〉，《文史學報》（臺中）16（1986年3月），頁117-129；謝貴文，〈清代臺灣循吏姚瑩的治安事功〉，《屏東教育大學學報》（屏東）24下（2006年3月），頁413-444；王震邦，〈同樣是循吏，規格大不同：平論陳星聚應有的歷史定位（上）〉，《中原文獻》（臺北）50:3（2018年7月），頁53-71；王震邦，〈同樣是循吏，規格大不同：平論陳星聚應有的歷史定位（下）〉，《中原文獻》51:1（2019年1月），頁22-39；謝貴文，〈清代鳳山知縣宋永清的政績〉，《高市文獻》（高雄）18:1（2005年3月），頁29-39；風塵孤劍客，〈臺灣第一循吏：曹公〉，《南臺文化》（高雄）9（2003年3月），頁19-24。

⁹ 陳宗仁，〈《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內容解析〉，收於華林甫、陸文寶主編，《清史地理研究 第

本文首先透過對蔣允焄及著作《東瀛紀典》進行考證，梳理蔣允焄的仕宦經歷及其在臺南的形象，並探討《東瀛紀典》的內容特色。其次討論十八世紀是形塑清代臺南城市面貌最重要的時期，其中蔣允焄和蔣元樞的貢獻最大。最後，透過兩位蔣姓知府的作品，分析十八世紀任職於帝國邊疆行政中心的地方官員如何透過圖像和文字表達其認知中官方行政及禮儀空間的理想樣貌，進而影響了今日吾人對清代臺南歷史空間的認識。

二、蔣允焄與臺南

蔣允焄出身貴州貴筑，字為光，號金竹。乾隆 28 年至 31 年（1763-1766）任臺灣知府，乾隆 34 年至 36 年（1769-1771）任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以下簡稱臺灣道），蔣允焄在臺灣不僅時間長，且經歷豐富，今日臺南流行的「蔣公子」傳說，有許多元素就是來自蔣允焄的事蹟。

傳說清代臺灣曾有官員人稱「蔣公子」，破壞了臺南嶽帝廟、天后宮、法華寺等地的風水，有「蔣公子敗地理」一說。蔣公子還與府城「七寺八廟」的傳說連結在一起，被認為是府城建設的奠基者。不管是破壞還是建設，這些故事應該在戰後的臺南市區相當流行，以致於 1994 年臺灣省文獻會在臺南市進行耆老口述歷史時，把蔣公子敗地理和七寺八廟都列入採訪題目，也引導幾位老人家列舉出他們所知道的說法。¹⁰ 為了解蔣允焄的歷史形象，以下先由「蔣公子」傳說討論傳說與蔣允焄的關係，再談蔣允焄的臺灣經驗在其地方官經歷中的意義。

（一）蔣允焄與蔣公子

關於「蔣公子」的身分、傳說與歷史意義，最有系統的整理與探討為黃典權所做的「蔣公子」系列研究。黃氏的蔣公子研究最初在 1953 年發表於《臺南文

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 305-323；陳宗仁，〈《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各圖的編次問題〉，《故宮文物月刊》（臺北）387（2015 年 6 月），頁 64-73。

¹⁰ 呂順安主編，《臺南市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 229、237。關於七寺八廟與蔣公子敗地理傳說的整理，另外還可參考范勝雄，〈臺郡三蔣與七寺八廟〉，收於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 2》（臺南：臺南市政府，1998），頁 1-17；范勝雄，〈府城地理傳說〉，收於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 3》（臺南：臺南市政府，1998），頁 15。

化》，認為蔣公子應該是臺灣知府蔣允焄。¹¹ 黃氏之後由於協助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委託《臺灣南部碑文集》調查整理工作，加上《臺灣文獻叢刊》陸續重印出版了清代的臺灣方志，在蔣允焄事蹟外，史料呈現出尚有蔣毓英與蔣元樞兩位蔣姓知府在臺南留下豐富政績，使黃氏二度撰文〈蔣公子研究：臺灣知府蔣元樞治績考〉及〈三研「蔣公子」〉推翻前說，認為蔣公子其實是三位蔣姓知府事蹟的融合與附會，難以說清楚是誰。¹²

若排除口傳的風水地理故事，單從文獻記載來說，日治時期文人在提到「蔣公子」時，蔣公子往往以風流太守的形象出現，是法華寺前半月樓及半月池的創建者。1905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登載了這則〈詩話〉：「臺南小南門外法華寺前。有半月池。太守蔣公子。嘗置美人競渡於其間。至今傳為佳話。」¹³ 明清時期習以太守為知府之雅稱，「太守蔣公子」就點出了蔣公子的知府身分。戰後初期盧嘉興在〈夢蝶園與法華寺〉一文中則以乾嘉之際文人章甫(1760-1816)所作〈郡守蔣金竹太守游龍潭記〉及〈法華寺懷古〉兩詩皆提及的風流太守為蔣允焄，說明蔣允焄在法華寺的亭臺建設如何影響到日治時期連橫等文人喜愛吟詠的南湖「美人競渡」故事。¹⁴ 黃典權最初將蔣公子視為蔣允焄，也就是從盧嘉興、石暘睢這一輩臺南鄉土史家得來的印象。¹⁵

黃典權對「蔣公子」傳說的考證與三位蔣姓知府的分析與疏理，促使人們注意到蔣毓英、蔣允焄和蔣元樞在臺灣史上的事蹟，尤其後兩者在乾隆時代的臺南主持了多項建設，當時豎立的碑碣與建設成果仍有不少遺跡留存，顯示十八世紀的臺灣知府對於府城的城市空間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其中蔣元樞的事蹟由於有《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重印出版而為人所熟知，¹⁶ 但早其 12 年在臺任官的

¹¹ 黃典權，〈由蔣公子說到蔣允焄（上）〉，《臺南文化》（臺南）3:1（1953年6月），頁67-71；黃典權，〈由蔣公子說到蔣允焄（下）〉，《臺南文化》3:2（1953年9月），頁65-70。

¹² 黃典權，〈蔣公子研究：臺灣知府蔣元樞治績考〉，收於中國文化學院臺灣研究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文物論集》（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6），頁121-145；黃典權，〈三研「蔣公子」〉，《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臺南）13（1987年3月），頁83-154。陳宗仁也從蔣元樞研究的角度整理了黃典權的蔣公子研究，參見陳宗仁，〈《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內容解析〉，頁305-323。

¹³ 遵儀寄，〈詩話：拾碎錦囊（五十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9月15日，第3版。

¹⁴ 盧嘉興，〈夢蝶園與法華寺〉，《臺灣研究彙集》（臺南）3（1967年7月），頁1-11。

¹⁵ 黃典權自述：「去年從石暘睢先生處知道那傳說紛云的蔣公子便是清乾隆年間做臺灣知府的蔣允焄。」參見黃典權，〈由蔣公子說到蔣允焄（上）〉，頁68。

¹⁶ 目前可見之《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除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之原件外，有三種重印版本：1. 重新

蔣允焄在臺南歷史上的意義，尚待進一步闡明。

（二）蔣允焄的地方官經歷

蔣允焄，生年大約在康熙 52 年（1713），¹⁷ 乾隆元年（1736）恩科舉人，乾隆 2 年（1737）丁巳科貴筑縣進士，隨後任翰林院檢討、一統志館纂修官。乾隆 8 年（1743）由翰林院改授浙江餘姚知縣。之後歷任直隸秦州秦安知縣、宣化府懷安知縣、正定府晉州知州、九江知府等府、縣官；乾隆 25 年（1760）在即將邁入 50 歲之際到福建任漳州知府。¹⁸ 閩浙總督楊廷璋非常賞識蔣允焄，曾以蔣氏「精明強幹，才守兼優，整飭海疆吏治，熟悉風土民情。任漳以來率屬力行實政，緝匪務盡根株，地方頗有起色，實為知府中出色之材，堪膺海外繁劇之任。」¹⁹ 極力向皇帝推薦蔣氏擔任臺灣知府的職位。蔣氏在乾隆 28 年 8 月 6 日上任臺灣知府，其知府任期中，更由於其上司臺灣道余文儀升任福建按察使，受委任於乾隆 29 年（1764）12 月至 30 年（1765）4 月間護理臺灣道兼提督學政。²⁰ 乾隆 31 年 7 月 21 日臺灣知府任滿後，蔣允焄被留在福建，短暫經歷福州知府、福建汀

打字，並以黑白影印圖版，刊於「臺灣文獻叢刊」者，參見蔣元樞原著、吳幅員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283 種，1970；1778 年原刊）；2. 蔣元樞原著、封思毅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3）；3. 蔣元樞原著、洪安全、林天人文字撰述，《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各版本的討論參見陳宗仁，〈《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內容解析〉，頁 305-323。

¹⁷ 據乾隆 28 年閩浙總督楊廷璋等人推薦蔣允焄擔任臺灣知府之奏摺，當時蔣氏 50 歲，推斷其生年約在康熙 52 年。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該院，1982），第 16 冊，頁 562-564。

¹⁸ 蔣允焄的任官經歷如下：乾隆 8 年任餘姚知縣，乾隆 14 至 16 年任秦安知縣，乾隆 17 年 7 月 9 日陝甘總督黃廷桂曾上奏皇帝有關秦安縣知縣蔣允焄之考語，乾隆 19 年任懷安知縣，乾隆 21 年任晉州知州，乾隆 23 年任九江知府，乾隆 25 年任漳州知府。參見唐若瀛纂修，《餘姚志》，愛如生「中國方志庫」，下載日期：2019 年 4 月 12 日，網址：<http://www.greatman.com.tw/fangchiku.htm>，卷 16，頁 17a〔按：凡引用自愛如生「中國方志庫」，以下省略「下載日期與網址」〕；費廷珍纂修，《直隸秦州新志》，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卷 7 下，頁 24；王者輔原本、張志奇續修，《宣化府志》，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卷 22 職官，頁 32；鄭大進纂修，《正定府志》，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卷 26，頁 4；達春市修、黃鳳樓纂，《九江府志》，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卷 25 文職，頁 25；李維鈺原本、吳聯薰增纂，《漳州府志》，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卷 12，頁 7；國立故宮博物院編，《乾隆朝軍機檔》，編號：008921，「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下載日期：2020 年 1 月 16 日，網址：<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

¹⁹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16 冊，頁 562-564。

²⁰ 據余文儀，〈為蒙恩補授福建按察使恭報到任日期事〉（乾隆 30 年 1 月 27 日）所載其臺灣道卸任日期，直到隔年 4 月新任臺灣道奇龍格到任。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23 冊，頁 765-766。

漳龍道等職。²¹ 乾隆 33 年（1768）清廷為了剿捕出身大目降（今臺南新化）山區的黃教等賊匪，「尤須熟諳臺地情形之員始能措置得宜」，故蔣氏以其擔任過臺灣知府的經歷，加上「老成諳練、辦事寔心」，得以在乾隆 34 年接任臺灣道。²² 這段時間蔣允焄除了平亂之外，又重修了自己在知府任內修築的洲仔尾塹岸提防，得到地方士民的稱讚。²³ 乾隆 36 年再任福建汀漳龍道，²⁴ 乾隆 40 年（1775）8 月至 41 年（1776）任福建按察使，終仕。²⁵ 透過《內閣大庫檔案》還可以觀察到，自乾隆 25 年以來，蔣氏受到連續三任閩浙總督楊廷璋、蘇昌及崔應階青睞，官運頗為順遂。

蔣允焄自乾隆 8 年展開其府縣官生涯以來，其為官受各地方志作者的讚賞，乾隆年間纂修的《餘姚志》、《直隸秦州新志》、光緒年間《漳州府志》均為其作傳。按其任官先後順序來看，《餘姚志》描述其「發奸摘伏，吏胥不能欺」，在處理訟案時「持法平恕」，展現其雖然初任地方官，但在面對衙門內部日常行事和人事的精明幹練；²⁶ 《直隸秦州新志》則提到他「平易近人，煦煦若慈母，窮鄉婦孺無不得至前言事者」；²⁷ 而《漳州府志》的作者則給予「平易近民，因俗為政」，使「百廢俱舉」等評價。²⁸ 這些不同時期的傳記顯示蔣允焄越來越能掌握面對衙門外的基層社會的辦法；所謂的「百廢俱舉」，更提醒我們蔣氏在漳州任官時主導了不少地方建設，比對隨後他在臺灣府的事蹟，可發現他在兩地同樣倡導了關帝廟、天后宮、書院等重修工程，顯然他將漳州的經驗帶到了臺灣，參與寺廟和書院建設可說是蔣氏福建時期的施政重點。

²¹ 福州知府，參見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編，《清代縉紳錄集成（2）：爵秩全本（乾隆 33 年秋）》（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頁 529；福建汀漳龍道，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32 冊，頁 783。

²² 閩浙總督臣崔應階奏，〈為臺灣道缺緊要請旨遴員調補事〉（乾隆 33 年 12 月 10 日），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23 冊，頁 783；陳國瑛等採集、王志楨點校，《臺灣采訪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頁 187。

²³ 〈蔣公堤碑記〉（乾隆 36 年），收於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文叢第 218 種，1966），頁 88-89。原碑位於今臺南市永康區三坎店糖廠。

²⁴ 李維鈺原本、吳聯薰增纂，《漳州府志》，卷 12，頁 4。

²⁵ 秦國經主編，唐益年、葉秀雲副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第 2 冊，頁 166。

²⁶ 唐若瀛纂修，《餘姚志》，卷 16，頁 17a。

²⁷ 費廷珍纂修，《直隸秦州新志》，卷 9 下，頁 20a。

²⁸ 李維鈺原本、吳聯薰增纂，《漳州府志》，卷 27，頁 11b。

在地方的文士紳商對蔣允焄的態度上，乾隆 30 年（1765）在臺灣知府任上興修水仙宮、德安橋、天后廟、關帝廟及龍王廟更衣亭時，都得到紳商捐錢立碑誌謝；²⁹ 隔年卸任知府時，地方文人亦為他鑄刻去思碑，³⁰ 臺南藥王廟則供奉其長生祿位，上刻「賜進士出身護理福建分巡臺灣道兼提督學政臺灣府正堂前翰林院檢討加七級紀錄六次大功德主蔣諱允焄長生祿位」，由其職銜可知是在其知府任期間入祀。最後在乾隆 36 年蔣氏第二次以臺灣道的身分來臺但要離職之際，則有「闔臺士民」勒石〈蔣公堤碑記〉誌其功德。透過以上地方人士為蔣氏製作的文物，可發現蔣氏在任職臺灣知府期間就與臺灣的士民紳商建立了良好的互動。可惜的是，蔣允焄在臺灣方志並沒有傳記，黃典權認為這是因為蔣允焄來臺時正值《續修臺灣府志》編修之際，不為生人立傳，然此說無法解釋為何十九世紀修纂的《續修臺灣縣志》仍然沒有為其修傳。³¹ 但從後者還是將大部分蔣允焄的碑記收入「藝文志」的情況來看，修志者還是相當看重蔣氏的貢獻。咸豐年間蔣氏家鄉刊印的《貴陽府志》強調他對臺灣的影響最為深遠，謂其「任臺日久，臺民尤切思慕」。³² 臺灣知府成為蔣允焄職涯中最後一個知府工作，其後就高升道臺，在臺灣府期間可說是其地方治理經驗的成熟階段。蔣允焄的地方經歷，反映一名州縣地方官從衙門內到衙門外的成長，最後能熟練的透過主持城市建設，將社會資源加以整合，加強自己在地方治理的社會基礎。

前述對於蔣允焄治官的紀錄，全是來自地方志與宮廷檔案，但蔣氏另外留下了一部包含圖像與自撰碑文的著作《東瀛紀典》，則讓我們可以跳脫外部觀點，看到官員如何以書籍的形式進行個人的表述。

²⁹ 〈水仙宮清界勒石碑記〉、〈重修關帝廟增建更衣亭碑記〉〈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重修龍王廟增建更衣亭碑記〉、〈大老爺蔣重修德安橋碑記〉，碑文參見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6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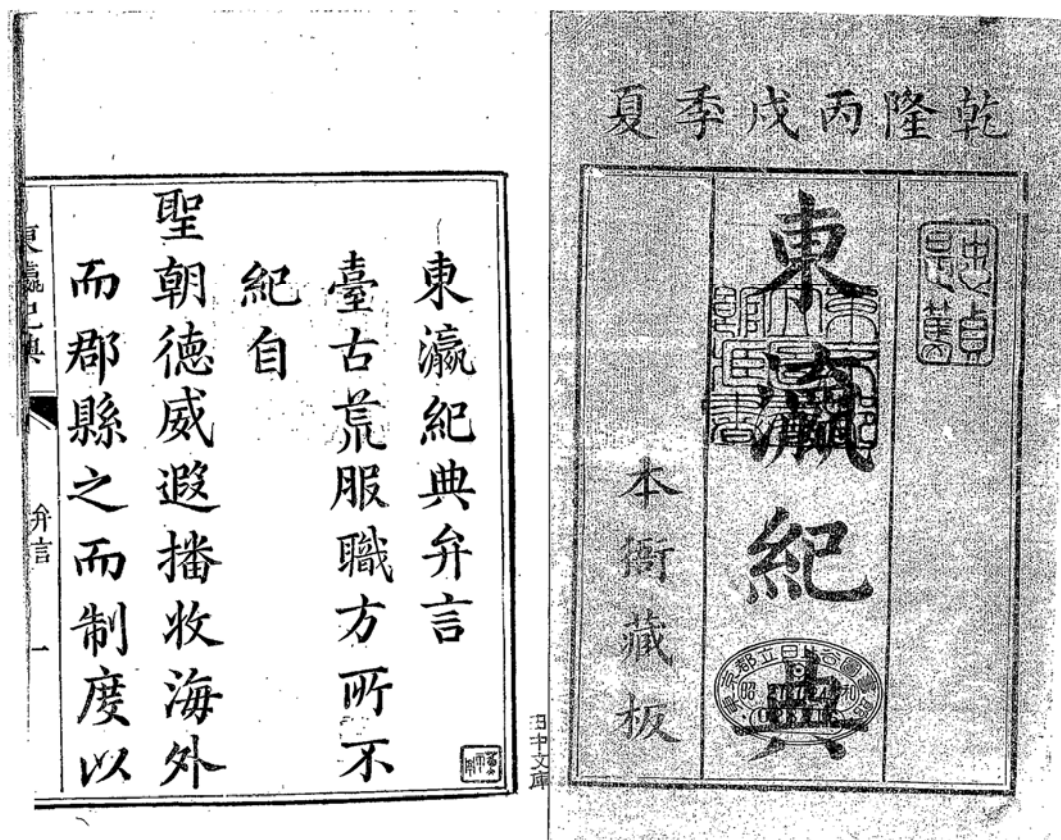
³⁰ 據《臺灣南部碑文集成》，在今臺南市普濟殿廟前曾見過乾隆 31 年崇文書院訓導和生員給臺灣知府蔣允焄的去思碑，惜原碑今已不知去向，當年此碑已殘缺不全，所抄錄之碑文參見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73-74。蔣允焄在漳州則因歷任漳州知府及汀漳龍道，在升福建按察使前夕，漳州百姓「勒石道左，以志去思」。參見李維鈺原本、吳聯薰增纂，《漳州府志》，卷 27，頁 11b。

³¹ 黃典權，〈三研「蔣公子」〉，頁 101。

³² 周作楫修、蕭瑄等纂，《貴陽府志》（成都：巴蜀書社，2006），卷 81，頁 2a。

三、《東瀛紀典》的內容特色

《東瀛紀典》封面除書名及「忠貞是篤」印文外，書有「乾隆丙戌季夏」及「本衙藏板」字樣，可知本書係乾隆 31 年 6 月刊印，即蔣允焄即將卸任臺灣知府之際。其「本衙」所指之處，從蔣氏在本書〈弁言〉落款「題於鴻指園」，可推測本書刻板最初應是收藏於鴻指園所在之臺灣府署，換言之這是一部在臺灣府製版，甚至刊印的書。(圖一)



圖一 《東瀛紀典》書影

資料來源：蔣允焄，《東瀛紀典》(1766) (東京：東京都立圖書館藏)，筆者翻攝。以下蔣允焄《東瀛紀典》之圖面皆同，不再贅述。

《東瀛紀典》的存在，最重要的依據來自嘉慶 12 年（1807）刊行，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的《續修臺灣縣志》（以下簡稱《謝志》）。其〈卷 6 藝文志〉記錄了一條簡短的書目：「東瀛紀典一卷·巡道蔣允焄著。」³³ 該〈藝文志〉依序有著述、奏疏、檄文、書、議、序、跋、客問、記、賦等 10 項分類，《東瀛紀典》被列為「著述」之一，與周嬰《東番志》、藍鼎元《東征集》等詩文集、臺灣府縣志並列。但是《謝志》只記了書目，並沒有進一步說明其內容，到了二十世紀初連橫在編纂《臺灣通史》〈藝文志·藝文表〉時，也只是抄錄了《謝志》書目，留下「東瀛祀典一卷·貴陽蔣允焄撰」的條目。連氏甚至將「紀典」改為「祀典」，我們不清楚這是單純筆誤，抑或是連氏其實也沒見過這本書，因此擅自「訂正」了書名，似乎從《謝志》以來這份文獻就僅存書名，未被臺灣的公共圖書館或藏書家所收藏，導致後人一直不清楚它究竟是什麼樣的著作。黃典權在進行蔣公子研究的過程中，就注意到此條書目，從書名和當時可見的碑刻內容猜測蔣氏在臺灣曾整理了一套祭祀的辦法，黃氏的猜測可謂相當敏銳，但當時因為找不到原件而無法證實。³⁴ 筆者無意間在東京都立圖書館的書目發現這筆館藏，以下先對這部書的現況及內容進行分析。

（一）典藏紀錄與影響

筆者所見的《東瀛紀典》典藏於東京都立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共一冊，在該館漢籍編目中，被歸類至史部地理類的「古蹟·名勝」項目下，原為田中乾郎藏書。³⁵ 「買上」即日文「買上げる」（かいあげる），為政府或公家單位向民間收購之意。據館方書目資料，《東瀛紀典》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日比谷圖書館購藏。戰時該館為了保護珍貴書籍文獻免於戰火，特別向民間學者、藏書家收購圖書疎開至東京郊外倉庫，1945 年 5 月該館在東京大空襲中被美軍炸毀，這些提早疎開避難倖存的資料，在戰後被納入東京都立圖書館館藏。當年日比谷圖

³³ 謝金鑾、鄭兼才總纂，黃美娥點校，《續修臺灣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卷 6 藝文一，頁 520。

³⁴ 黃典權，〈由蔣公子說到蔣允焄（下）〉，頁 66；連雅堂，《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通史社，1920），中冊，卷 24 藝文表三，頁 701。

³⁵ 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編，《特別買上文庫目錄·諸家漢籍》（東京：該館，1971），頁 1。

書館購藏的對象，就包括東京本鄉知名的漢籍書店「文求堂」店主田中慶太郎及田中乾郎父子，後者就是《東瀛紀典》原來的藏書者。³⁶

此書刊行後究竟有多少人看到、流傳多廣，雖然沒有確切的數據，但是非常可能僅在清代的臺灣官署或修志館內部流通。目前唯一可作為明確證據，證明此刊本確實存在的紀錄只有《謝志》。此外，《東瀛紀典》與戰後被重印多次的蔣元樞《重修臺郡建築圖說》則有不少可相互比較之處，不排除後者是受到前者的影響。雖然兩者在出版形式上完全不同，前者是刊本，後者是成組的紙本彩繪冊頁，但圖文結構非常相似，都係以官員任內政績分別為文、成圖所構成。有意思的是，蔣允焄與蔣元樞皆曾在各地任官，亦都整建不少建築，但就目前所見，似乎都只在臺灣任上留下圖冊。就有限的史料來看，蔣允焄和蔣元樞兩人可能的聯繫在乾隆 40 年蔣元樞上任臺灣知府時，蔣允焄為福建按察使，兩人為上司下屬關係，更重要的是，蔣允焄的《東瀛紀典》當時應是臺灣府署藏書，既然嘉慶年間的修志者都能看到，蔣元樞應該也看得到這本書。《東瀛紀典》的發現，或可說明蔣元樞《重修臺郡建築圖說》的出現並非憑空創造，而有脈絡可循。

（二）內容結構

《東瀛紀典》內除蔣允焄所作之〈弁言〉外，總共收錄 18 幅圖與 16 篇文章，每篇文章是蔣允焄任臺灣知府時所做的一項建設，各項建設以圖名為始，其次為單色版建築線描圖，再次則是蔣允焄為該建築所撰寫的記或跋。16 篇文章中只有〈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沒有圖，其原因可能是南湖書院與火神廟都位在南湖畔，因此兩圖都已經畫到南湖的緣故。至於關帝廟、天后廟及龍王廟三項建設除了有廟圖之外，還各有一幅更衣亭圖（內文篇名為「更衣亭圖」，但目錄記為「官廳圖」），因此這三間廟都有兩幅圖。從各文章內容及今日尚存的石碑則可推測，這些文章可能都曾經勒石展示在相關的建築周遭，只是大部分已經消失。（《東瀛紀典》圖文順序及方志收錄情況見表一）

³⁶ 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編，《特別買上文庫目錄·諸家漢籍》，頁 1；佐藤政孝，《東京の近代図書館史》（東京：新風舍，1998），頁 157-158。

表一 《東瀛紀典》目次與方志收錄碑記對照表

建設	文獻	《東瀛紀典》(註 1) 1766 年刊	《續修臺灣府志》 1774 年刊	《續修臺灣縣志》 1807 年刊
一	萬壽宮	1. 萬壽宮圖		
		2. 新建萬壽宮碑記	新建萬壽宮碑記	新建萬壽宮碑記
二	海東書院	3. 海東書院圖		
		4. 改建海東書院碑記		改建海東書院碑記
三	南湖書院	5. 南湖書院圖		
		6. 新建南湖書院碑記		新建南湖書院碑記
四	關帝廟	7. 關帝廟圖		
		8. 關帝廟更衣亭圖		
五	天后宮	9. 新建武廟官廳碑記	增建武廟官廳碑記	增建武廟官廳碑記
		10. 天后宮圖		
六	鎮北坊天后廟	11. 天后宮更衣亭圖		
		12. 新建天后宮官廳碑記	增建天后宮官廳碑記	
七	龍王廟	13. 小媽祖宮圖		
		14. 重修鎮北坊天后廟碑記		重修鎮北坊天后廟碑記
八	風神廟	15. 龍王廟圖		
		16. 龍王廟更衣亭圖		
九	火神廟	17. 新建龍王廟官廳碑記		
		18. 風神廟圖		
十	藥王廟	19. 重修風神廟碑記		
		20. 火神廟圖		
十一	彌陀寺	21. 重建火神廟碑記	重建火神廟碑記	
		22. 藥王廟圖		
十二	水仙宮	23. 改建藥王廟碑記		
		24. 彌陀寺圖		
十三	德安橋	25. 重修彌陀寺碑記		
		26. 水僊宮圖		
十四	南湖	27. 水仙宮清界勒石記(註 2)		水仙宮清界勒石記
		28. 德安橋圖		
十五	鴻指園	29. 重建德安橋碑記		重建德安橋碑記
		30. 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		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
十六	塹岸橋	31. 鴻指園圖		
		32. 鴻指園題跋(註 3)		卷二政志抄錄
		33. 塹岸橋圖		
		34. 新建塹岸橋碑記(註 4)		新建塹岸橋碑記

說明：灰階底色者為過去未見之碑文。

註 1：本表按《東瀛紀典》的目錄依序編排。

註 2：石碑尚存，位於臺南市水仙宮。

註 3：石碑尚存，位於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

註 4：石碑尚存，位於臺南市鹽行天后宮。

資料來源：蔣允焄，《東瀛紀典》；余文儀主修、黃美娥點校，《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謝金鑾、鄭兼才總纂，黃美娥點校，《續修臺灣縣志》；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何培夫主編、孫德彪監修，《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2)，上、下冊；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

但是，將各篇內容與「臺灣文獻叢刊」所收集的史料進行比對，可知這些文章的內容部分已被抄錄在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乾隆 39 年〔1774〕刊行，以下簡稱《余志》）及謝金鑾主修《續修臺灣縣志》兩種清代方志中。但〈新建龍王廟官廳碑記〉、〈重修風神廟碑記〉、〈改建藥王廟碑記〉、〈重修彌陀寺碑記〉四篇之內容則從未在目前任何已出版的清代史料中出現，可補充說明該建築的相關記載與歷史，並增加吾人對蔣允焄事蹟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東瀛紀典》提供了每件工事前所未見的圖像。

從方志收錄的情況，還可一窺蔣允焄的上司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的過程。從表一可知，《余志》僅收錄〈新建萬壽宮碑記〉、〈增建武廟官廳碑記〉、〈增建天后宮官廳碑記〉、〈重建火神廟碑記〉等四篇碑記，比對其內文，萬壽宮、天后宮、火神廟三篇在工期及參與者名單都不如《東瀛紀典》的版本齊全。余文儀在乾隆 25 年 5 月至 28 年 4 月任臺灣知府，乾隆 28 年 12 月 19 日補授臺灣道，乾隆 29 年陞任福建按察使離開臺灣，但乾隆 31 年和乾隆 33 年底因淡水兇番殺人和黃教事件，皇帝以其熟悉臺地情勢，兩度派任來臺查勘剿捕審案。³⁷ 乾隆 36 年余文儀任福建巡撫，《余志》即是在其閩撫任上的乾隆 39 年刊行。而《余志》收錄的四篇碑文記載的建設都在乾隆 30 年才完工，可知儘管在《余志》刊行時《東瀛紀典》早已出版，但余文儀匯集修纂資料的時間大概只在乾隆 28、29 年在臺期間。余文儀所收錄的，正是蔣氏建設中的草稿或初稿，之後他顯然也沒看到可以算是最後定稿的《東瀛紀典》，蔣允焄後來完成的碑記就沒有被收錄。這些收錄不全或內容簡省的問題在《謝志》就比較小，《東瀛紀典》總共 16 篇文章，《謝志》就收錄了其中 10 篇，而且其抄錄的內容與《東瀛紀典》一字不差，加上《謝志》藝文志也羅列《東瀛紀典》進書目，可知編纂者一定看得到這部書，遂將其文字內容徵引至方志中。

在編排順序上，《東瀛紀典》以新建朝拜皇帝的萬壽宮之碑記作為首篇，其次為改建或新建海東、南湖兩所官設書院，再次為武廟、天后宮、龍王廟、風神廟、火神廟、藥王廟、彌陀寺等寺廟的碑記，最後是處理港道、橋樑、湖泊和官方庭

³⁷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16 冊，頁 562-564；第 19 冊，頁 624-626；第 23 冊，頁 765-766。

園的碑記。這個次序並非按照事情發生的時間排列，而是展現了這些建築在知府蔣允焄心目中在政制與施政上的優先性。特別是蔣氏把書院安排在萬壽宮之後，顯然他相當重視書院教育，認為重要性比其他官祀建築還高。

（三）圖畫特色

《東瀛紀典》的圖像與清代臺灣方志常見的建築圖和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非常相似，都採用界尺等工具勾勒嚴謹的直線。但主要有兩點差異。以《東瀛紀典》的〈萬壽宮圖〉、王禮主修《臺灣縣志》（以下簡稱《王志》）的〈萬壽宮圖〉以及蔣元樞的〈恭修萬壽宮圖〉為例，³⁸ 首先，《東瀛紀典》圖面的視角均為自右下至左上或左下至右上鳥瞰，《王志》和蔣元樞的圖主要是從正中央由下往上的視角，每棟建築物的畫法都是模擬人站在建築正前方所看到的建築立面。第二，《東瀛紀典》使用了中國傳統宮觀樓閣界畫的技巧，其整體線條大致有平行且規律的角度，增強建築物的深度、立體感與空間合理性，並對建築本身的結構、裝飾的描繪較為細緻。³⁹ 《王志》和蔣元樞的圖雖然也用了大量的直線，但是四周建築的視角不一致，甚至在周圍的部分直接捨去深度，使建築平面化，因此較無法呈現立體感，其主要的的作用或目的是表現平面的空間布局。地方志和蔣元樞所做的圖，基本上是繼承「會典圖」的傳統，表現禮部所規定的祀典空間。⁴⁰（圖二至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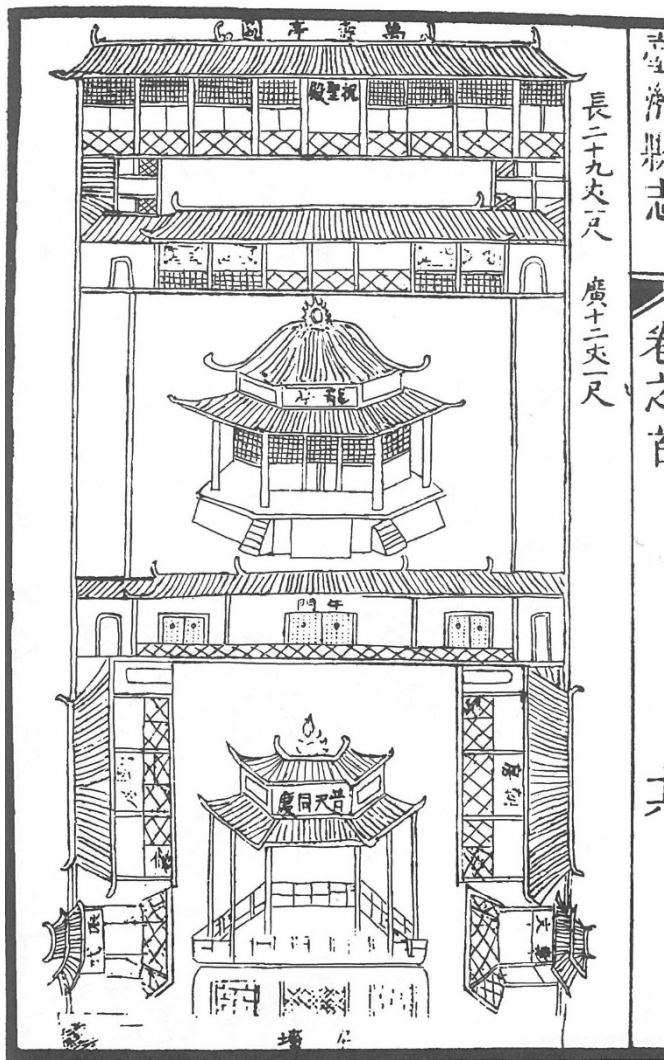
從形式上來說，《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與《東瀛紀典》都是官員在某地為官時為個人功績製作的圖文紀錄，一方面自述其任內興修各項建設的因由經過，一方面為各建設繪製圖像。如果單單取其圖像的部分，可與藝術史學者梅韻秋所觀察到的，嘉、道年間流行結合「生平事蹟圖」與「天下名勝圖」兩種傳統所作的官員自傳圖視為同一脈絡下的產物，但是《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與《東瀛紀典》整體上是圖文並重，考慮到兩位作者都強調了這些建設對於為政及地方治理的重

³⁸ 蔣允焄，《東瀛紀典》，頁 1b-2a；王禮主修、王志楨點校，《臺灣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卷首，輿圖，頁 70；蔣元樞原著、封思毅主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頁 4。

³⁹ 彭萊撰文，《界畫樓閣：中國山水畫通鑒》（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頁 8-12。

⁴⁰ 由於《欽定大清會典圖》沒有萬壽宮圖，因此圖五選擇祭祀皇帝祖先的大廟與地方的萬壽宮進行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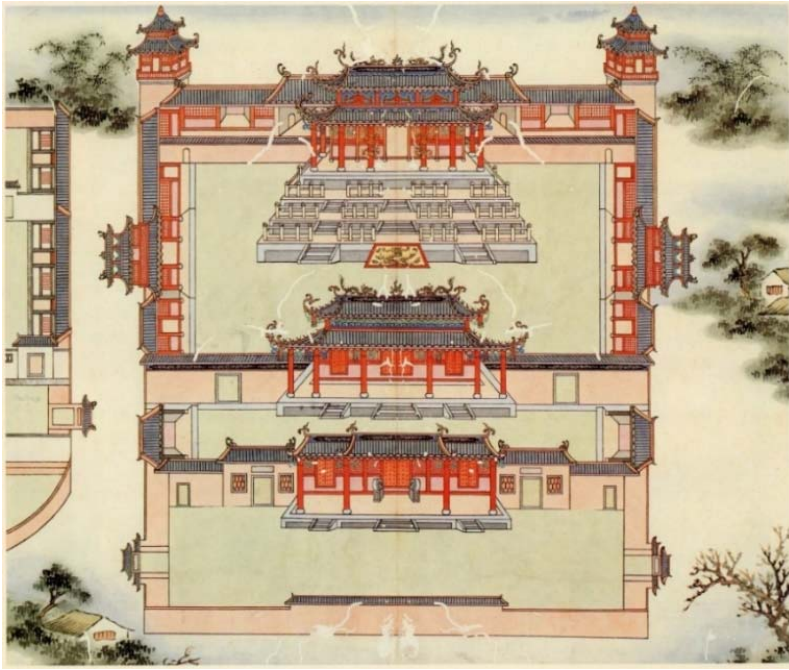
要性，筆者認為這兩組作品可視為一種有別於方志和傳統輿圖的新型行政文類。⁴¹



圖二 臺灣縣志〈萬壽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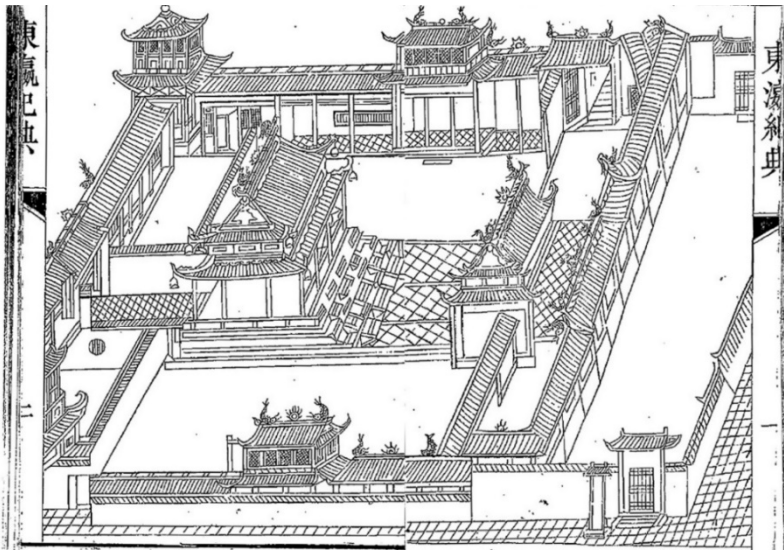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王禮主修、王志楮點校，《臺灣縣志》，卷首。

⁴¹ 明清兩代官員的視覺文化蓬勃發展，流行將個人為宦經歷及具體政績做紀實性的描繪，如「宦蹟圖」、「戰績圖」都可視為此文化下的產品，特別是到十九世紀嘉道年間，官員偏尚以名勝山水圖來呈現生平經歷。相關研究可參考梅韻秋，〈天下名勝的私家化：清代嘉、道年間自傳體紀遊圖譜的興起〉，《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臺北）41（2016年9月），頁a13-a14、303-370；馬雅貞〈戰勳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臺北）17（2011年12月），頁6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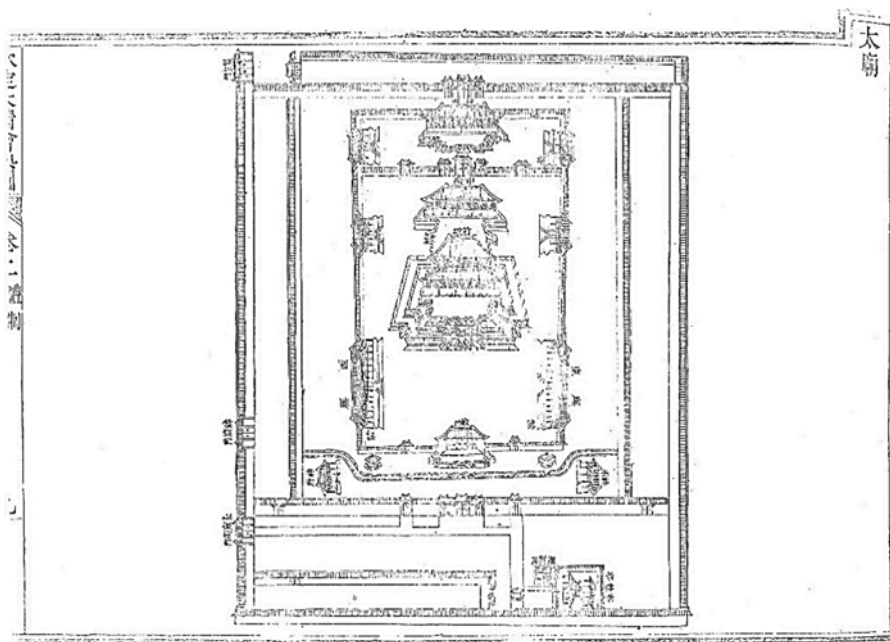
圖三 蔣元樞〈恭修萬壽宮圖〉

資料來源：蔣元樞原著、封思毅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圖四 蔣允焄《東瀛紀典》〈萬壽宮圖〉

說明：本圖原為兩頁，經筆者接圖處理，以下《東瀛紀典》之圖面皆以同樣方式處理，不再贅述。



圖五 《清會典》〈太廟圖〉

資料來源：托津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圖（嘉慶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卷二禮制，太廟。

四、地方治理與圖像表達

《東瀛紀典》所記錄的工事項目雖然只有 16 種，然而臺灣府的建築不止於此，與其相差約十年的後輩臺灣知府蔣元樞（1775-1778 年任），就在臺灣府城內修了 20 多種建築與橋樑。官員是否有某種標準，選擇性的執行這些建設工事？據蔣允焄自述，乃是「爰議典章，以時修舉，每一工成，鐫石以記，裒而集之，題曰東瀛紀典。」⁴² 此說展現他自認這些建設，都是與實踐朝廷典章有關的建築

⁴² 蔣允焄，〈東瀛紀典弁言〉，《東瀛紀典》，頁 1a-4a。〈東瀛紀典弁言〉全文如下：「臺古荒服，職方所不紀。自聖朝德威遐播，牧海外而郡縣之，而制度以立稽。昔開基日，大綱宏舉，八十年於茲矣，而典章文物郁郁彬彬，猶或有待者。風氣以漸而開制度，因時而密其勢然也。予自癸未量移茲郡，稽古定〔定〕制，如朝儀、祀典、公廡、學舍，以及橋樑、水利等，概有建置以求燦備。蓋今之臺灣與昔異，無不耕之土、無不聚之民，庶且富矣，獨其所議加者，教耳。崇禮事以昭盛軌，飾典則以熙鴻圖，守土者所有事也。爰議典章，以時修舉，每一工成，鐫石以紀，裒而集之，題曰東瀛紀典，蓋欲使殊方芴昧，咸曜光明，忠敬質文，應時遞起。予守土亦謹司其柄，而順布之耳。文奚足云。時乾隆丙戌仲夏，貴陽蔣允焄題於鴻指園。」

表二 蔣允焄與蔣元樞建設項目

		蔣允焄	蔣元樞
祀典	萬壽宮	新建萬壽宮碑記	恭修萬壽宮圖說
	關帝廟	新建武廟官廳碑記	重修關帝廟圖說
	天后宮	新建天后宮官廳碑記、重修鎮北坊天后廟碑記	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
	龍王廟	新建龍王廟官廳碑記	重修龍王廟圖說
	風神廟	重修風神廟碑記	重修風神廟並建官廳馬頭石坊圖說
	先農壇		重修臺郡先農壇圖說
	火神廟	重建火神廟碑記	
	城隍廟		重修臺灣府城隍廟圖說
	藥王廟	改建藥王廟碑記	
	水仙宮	水仙宮清界勒石記	
	祭孔		孔廟禮器圖說、文廟樂器圖說、佾舞圖說
規制	城池		重建臺灣郡城圖說
	衙署		移建中營衙署圖說、捐建南路兩營公署圖說、捐建各營兵屋圖說
	公館		移建臺灣佐屬公館圖說、新建鹿耳門公館圖說
	橋樑	重建德安橋碑記	重建臺郡橋梁圖說
	堤岸	新建塹岸橋碑記	重修塹岸橋圖說、修築安平石岸圖說
	水利	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	捐建澎湖西嶼浮圖圖說
	鹽務		鼎建鹽課大館記、重建州南鹽場圖說、重建州南場禹帝廟圖說、重修瀨北場上帝廟圖說
	船廠		鼎建臺郡軍工廠圖說
	義塚		建設南壇義塚並殯舍圖說、捐建北門兵丁義塚圖說
	恤政		捐修臺鳳諸三縣養濟院、普濟堂圖說
	防務		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圖說、建設鳳邑望樓圖說、建設臺邑望樓圖說、建設諸邑望樓圖說、建設彰化縣望樓圖說、建設淡水廳望樓圖說
名勝	重修彌陀寺碑記、鴻指園題跋、(南湖)	重修海會寺圖說	
學校	學校		重修臺灣府學圖說、重建臺灣縣學圖說
	書院	改建海東書院碑記、新建南湖書院碑記	重修臺郡崇文書院魁星閣圖說

說明：新建者以灰階底色表示。

資料來源：蔣允焄，《東瀛紀典》；蔣元樞原著、封思毅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設施，即使是修築橋樑，也引用《周禮》、《爾雅》等典籍說明事關「王政」，為「政典不可闕」；甚至將書名取為「紀典」，彰顯其記錄致力維護典制的用意。陳宗仁研究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編次問題，亦發現蔣元樞所涉及的建設，都應視為地方長官之職責。⁴³「爰議典章」不只是一種政治修辭，賦予官員大興土木正當性的說法，而是所有建設皆是官員奉行王政所需經營者。儘管如此，在與《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比較之後，《東瀛紀典》仍能讓我們看出蔣允焄的施政偏好或特殊之處。（蔣允焄修建各建築所在位置，參見圖六）



圖六 蔣允焄建物位置圖

說明：本圖城牆及建物位置參考〈乾隆臺灣輿圖〉；魯鼎梅修、王必昌纂，《重修臺灣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首，城池圖；魏瀚等繪製，〈臺灣府城街道全圖〉（1874-1875），收於賴志彰、魏德文編，《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8），圖 IV.15。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⁴³ 陳宗仁，〈《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各圖的編次問題〉，頁 64-73。

表二係沿用陳宗仁給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建議的排序架構，此架構來自方志的分類，筆者在認同此架構的基礎上，將蔣元樞各圖的歸類稍做調整，並加上蔣允焄的政績進行比較。本表可以觀察到兩位蔣知府建設的項目主要有兩點差異。第一，在新建項目的類型上，蔣允焄集中在祀典類，蔣元樞以規制類為主。第二，兩蔣同樣在知府任上護理（低官代理高官職）過更高層級的臺灣道，但蔣允焄的建設區域始終集中在府城內部及緊鄰城牆的近郊設施，蔣元樞則擴及全臺，甚至到澎湖。蔣允焄聚焦於府城的建設，正好可以幫助我們觀察地方官員對於城市空間經營的想法與實踐過程。本節就《東瀛紀典》之圖像和碑文，分為祀典建築、規制建築與書院空間三項進行分析。

（一）祀典建築

地方官員如何將國家祀典移植到地方，過去學界多以方志說明儀典空間的建構和儀式的政治內涵，同時也認同方志是相當重要的文化工具。⁴⁴ 然而方志透過選擇與分類，提供的是一套帝國的知識與論述，分析官員在方志之外所留下的文獻、碑刻及其行跡，則可讓我們對於其在地方社會如何實踐、展演這套論述有更多的了解。

蔣允焄在參與整修的萬壽宮、關帝廟、天后宮、龍王廟、風神廟、火神廟、藥王廟之碑文中，都提到了這些建築有關「禮制」和「祀典」，蔣氏又特別強調，要舉行相關的禮儀祭典，需要有相應的空間。

1. 萬壽宮

以萬壽宮來說，雖然臺灣府在康熙朝已在永康里建了供奉皇帝龍牌給官員朝拜的「萬壽亭」，但自從府城築牆後，萬壽亭就變得遠隔城外，「每大慶典，出郭門、廢啟閉，甚不便之」。⁴⁵ 這裡的慶典，指的是皇帝的生日「萬壽節」及元旦、冬至等歲時節日。乾隆初年修纂之《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就提到，臺灣的文武官員在這些日子除了當天四鼓（凌晨 1 至 3 時）至萬壽亭行禮外，在萬壽節前後三

⁴⁴ 有關帝國運用方志處理典制的議題，參見林開世，〈方志的呈現與再現：以《噶瑪蘭廳志》為例〉，頁 1-60；洪健榮，〈崇德報功與神道設教：清代臺灣方志祀典門類的知識建構〉，頁 1-58；張崑振，〈清代臺灣方志所載官祀建築之時代意義〉，《臺灣文獻》56:2（2005 年 6 月），頁 1-22。

⁴⁵ 蔣允焄，〈新建萬壽宮碑記〉，收於蔣允焄，《東瀛紀典》，頁 3a-7b。

日更要每天五鼓（凌晨3至5時）到場坐班。深夜出城行路，對官員和守城人來說，想來都是疲累惱人。⁴⁶ 雖然乾隆17年（1752）改在府學明倫堂設龍亭行禮，但場地狹隘，終究是權宜之計。⁴⁷ 乾隆30年6月蔣允焄在城內擇地重新建造萬壽宮，乾隆31年2月落成。新建的萬壽宮位於府城東安坊，原是乾隆4年（1739）巡臺御史單德謨所建的校士院（舉行科考之所），乾隆27年（1762）改作為海東書院；⁴⁸ 乾隆30年遷走海東書院，作為萬壽宮之用。在蔣允焄繪製的圖像中（見圖四），萬壽宮中有三進，前有短牆，兩側及後方各以廂房圍起，後方角落有角樓，兩側亦有閣樓，畫面中心落在第三進的大殿及其前方天井和左右兩側的閣樓，代表皇帝的龍牌應該是供奉在此殿之中。

2. 增建官廳

關帝、天后、龍王三廟所整建的重點不是改建寺廟本體，而是增建容納官員祭祀的準備空間——「官廳」（亦稱更衣亭或公廨），蔣允焄謂其理由：「每歲時行禮，集廟亭者，無停車所」（關帝廟）；「凡祭有正堂，由必有廟門外之夾室，古所為告濯具、告充、告潔者」（天后宮）；「無公廨以襄行禮」（龍王廟）。而這些官廳都在乾隆30年3月分別於關帝廟左側、龍王廟右側、天后廟右側購買民宅增建完成，並且有一群出資的地方紳衿邀請臺灣鎮標左營游擊署南路營參將趙宗潤⁴⁹ 另外撰文勒石記功。筆者爬梳《清會典》與其他地方志，並沒有發現清代有針對官廟設置官廳或更衣亭的規定，蔣允焄增建官廳的舉動，可能只是官員個人對於禮儀實踐空間的理解，顯示表面上看似具有共同準則的行政與禮儀空間，也不是每個官員都一樣。

⁴⁶ 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文叢第74種，1961；1740年原刊），卷9典禮，頁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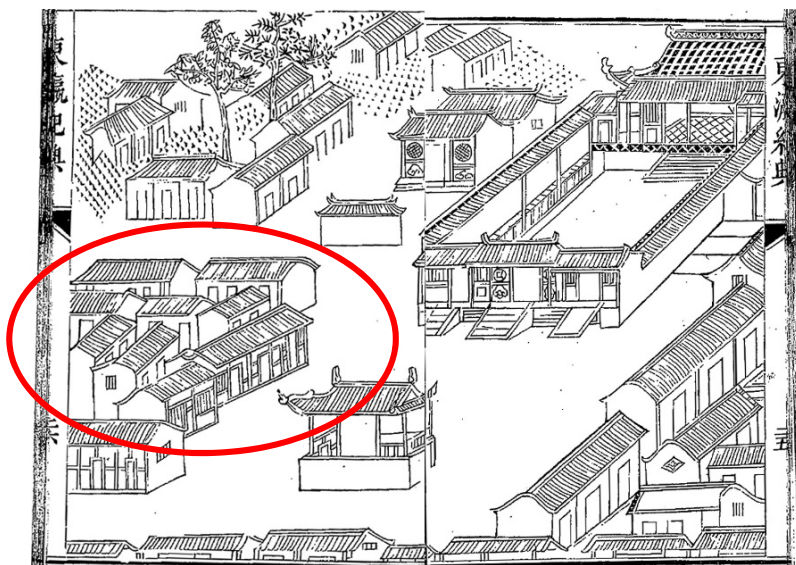
⁴⁷ 蔣允焄，〈新建萬壽宮碑記〉言：「今上御極十有七年，文武僚案，議就郡庠明倫堂設龍亭行禮，蓋一時權宜之計。」乾隆17年刊行之《重修臺灣縣志》亦說明當時萬壽節行慶賀禮，「結綵於府學明倫堂，備鼓樂儀仗，迎龍亭奉堂上。」參見魯鼎梅修、王必昌纂，《重修臺灣縣志》，卷7，頁1b。

⁴⁸ 由時任臺灣道兼提督學政的覺羅四明遷建海東書院至原校士院址，參見覺羅四明，〈改建海東書院記〉，收於余文儀主修、黃美娥點校，《續修臺灣府志》，卷8學校，頁489-490；卷22藝文三，頁1017。

⁴⁹ 關於趙宗潤的紀錄十分有限，僅知他籍隸正紅旗，乾隆27年12月至乾隆30年11月任職臺灣鎮標左營游擊，曾在營中經手兵馬、錢糧、軍火等項。參見謝金鑾、鄭兼才總纂，黃美娥點校，《續修臺灣縣志》，卷4軍志，頁366；《內閣大庫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登錄號：00324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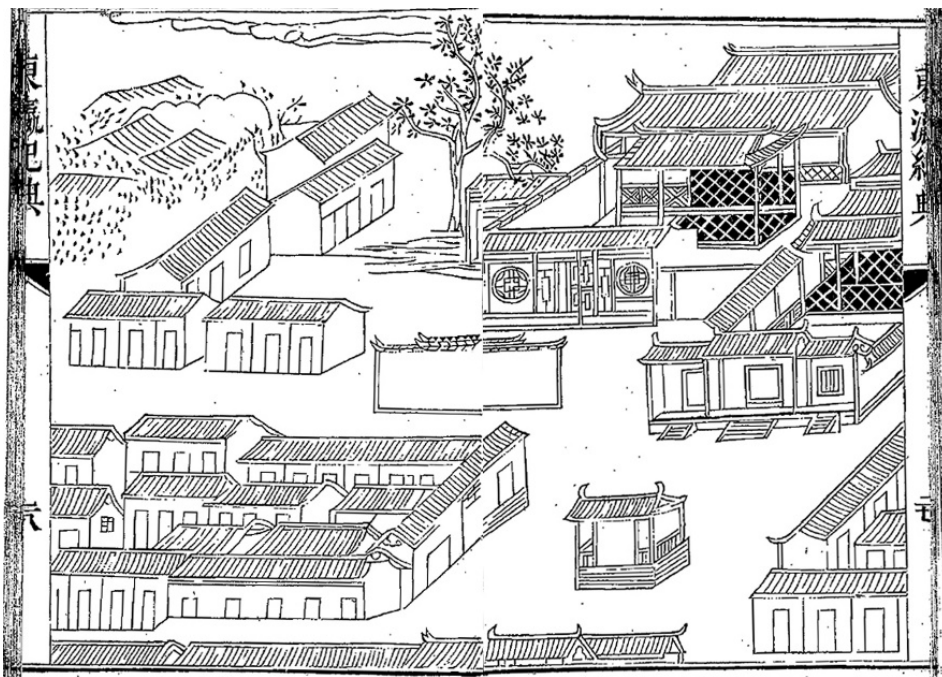
蔣允焄為這三間廟各留下兩幅圖像，分別是〈關帝廟圖〉、〈關帝廟更衣亭圖〉、〈天后宮圖〉、〈天后宮更衣亭圖〉、〈龍王廟圖〉、〈龍王廟更衣亭圖〉等六幅圖。三廟的廟圖和更衣亭圖在視角與構圖並無太大差異，畫者相當注意描繪主角建築與周圍房舍、街道間的空間關係。更衣亭圖與廟圖差異在於，更衣亭圖把畫面的中心由廟移動到更衣亭，並且把更衣亭的部分畫得較大而精細。關帝廟的兩幅圖將廟門朝右，天后宮和龍王廟的廟門朝下，則顯示這六張圖皆遵循著清代臺灣輿圖以圖左為北方的習慣。

與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所收錄的關帝廟、天后宮、和龍王廟三圖比較，蔣元樞的圖只畫了該當寺廟，捨去了寺廟四周的景物環境，只是簡單畫了樹木和零星的屋舍做點綴。而在蔣允焄的圖中，即使周圍的房舍街道並不是圖畫的主角，畫者也沒有忽略或省略其存在，並在畫面中安排適當的相對位置和距離，不僅使得畫面整體看起來相當寫實，也反映相關碑文中都提到三廟「雜闐闐中」（關帝廟）、「近市囂」（天后宮）、「地當康衢囂市」（龍王廟）座落在市街中的描述。例如，與龍王廟前方整齊的屋舍相比，天后宮廟埕左方的屋舍明顯排列歪斜、不齊整，呈現當年天后宮前市集店鋪雜亂紛陳的樣貌。（圖七）



圖七 蔣允焄〈天后宮圖〉

說明：廟埕左方圈起處屋舍排列歪斜。



圖八 蔣允焄〈天后宮更衣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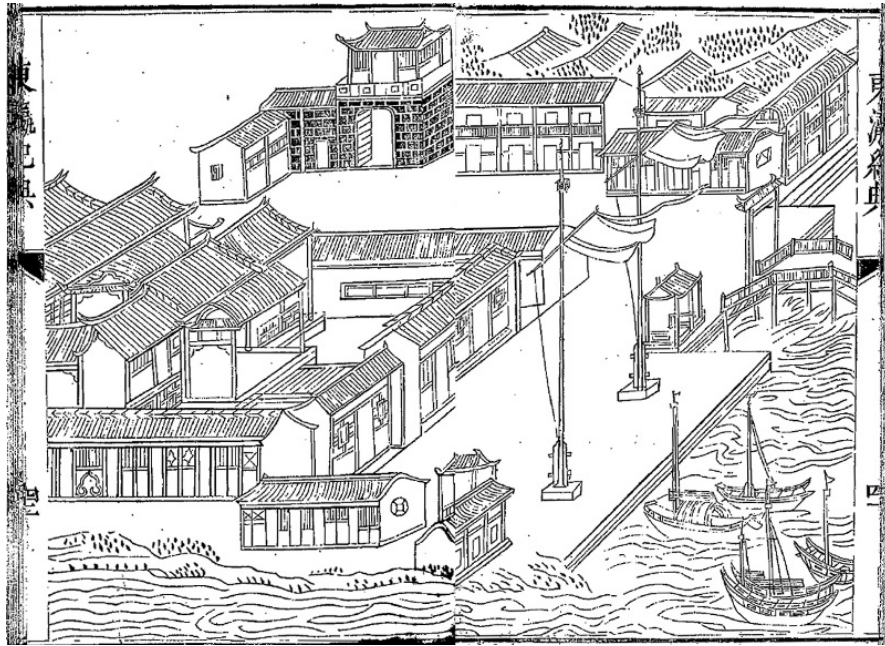
3. 祀典及其之外

風神廟、火神廟、藥王廟等廟也都是針對《清會典》列舉的官祀壇廟加以修葺。根據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則例》，風神與龍王皆屬於中祀，⁵⁰ 火神與藥王則與關帝、天后一樣屬於群祀。⁵¹ 臺灣府將風神的祭祀從風雲雷雨壇獨立出來建廟，是乾隆4年的事，而風神廟在臺灣府除了祀典的意義外，更重要的是它位於府城大西門外的口岸，是官僚到任登岸與離任登船，送迎往來之所，在地方行政與交通發揮相當重要的功能。⁵² 蔣允焄和蔣元樞也都為風神廟繪製圖像，兩者雖視覺角度有些差異，但都呈現了風神廟與碼頭、大西門、橋樑和船隻的關係。蔣允焄特別把畫面截切在正殿後側，捨去後殿，使焦點集中在正殿前方至碼頭之間，展現比起建築本身，其更關注口岸交通與官僚活動空間的意圖。（圖九、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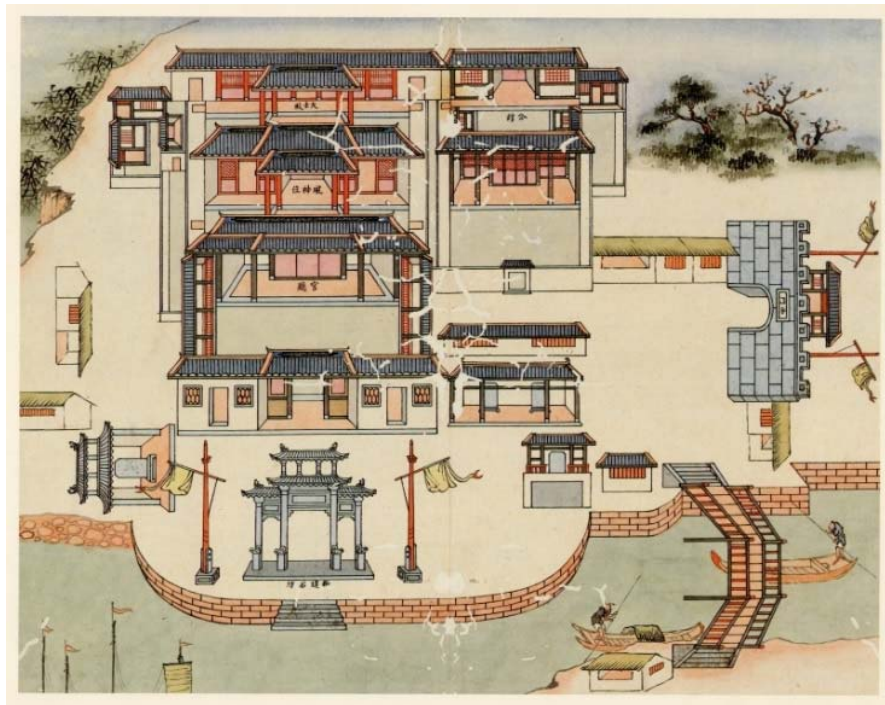
⁵⁰ 蔣溥、孫嘉淦等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卷83，頁41a-44b。

⁵¹ 蔣溥、孫嘉淦等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84，頁2a、11b-15a。

⁵² 關於風神廟的歷史沿革，參見陳冠妃，〈從碑亭到鐘鼓樓：談臺南接官亭風神廟石亭的「修復」問題〉，《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臺南）11（2016年5月），頁225-235。



圖九 蔣允焄〈風神廟圖〉



圖十 蔣元樞〈重修風神廟並建官廳馬頭石坊圖〉

水仙宮和藥王廟位於今日俗稱五條港的地帶，十八世紀正好也是以水仙宮為核心的府城郊商整合港口勢力的時期。

府城西部地區絕大多數的廟宇都是坐東向西，面朝海洋，部分位於街路上的廟宇是南北向，唯獨位於北勢街尾的藥王廟獨具一格，是坐西向東，背對著海洋。據藥王廟的說法，是因為藥王大帝必須上山採藥之故，而府城的山地就位在東邊。

目前我們對於藥王廟建廟歷史的理解主要來自道光 18 年（1838）的碑記：

自我北勢街開基以來，塑祀藥王大帝，以為合境之保障。前祀藥王之初，以店舖充作廟廊。因合境人等屢受藥王庇祐，即於乾隆甲申年〔按：乾隆 29 年〕，合境公同爰議，糾題捐金，卜其吉地，重建廟宇，以酬藥王庇祐之德也。但廟宇近於海疆，年久定然損壞。至道光甲申年〔按：道光 4 年（1824）〕，經蒙各郊舖及本境人等，喜助捐金，重修起蓋。今既告竣，理當叩謝福神，設醮慶成、祈安。庶各郊舖及合境人等四時平安，護安無疆矣。仍立石碑，計刊各喜助捐金，以彰虔誠之盛情矣。敬書稽首刊石以誌之。

〔按：以下為捐金名單，略；底線由筆者所加〕

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桂月 日，前董事落成龔文瑞、陳瑞興，續修董事蔡枕觀、蔡來觀、蔡趁觀、蔡媽德，續修落成陳瑞興勒石。⁵³

道光 18 年的碑記記載了該廟原本的廟廊也是北勢街街民的店舖，乾隆 29 年才擇地重建廟宇。根據蔣允焄〈改建藥王廟碑記〉以及廟裡供奉至今的蔣允焄長生祿位，⁵⁴ 可確認乾隆 29 年的修廟行動，實受到蔣允焄的支持。蔣允焄在其碑記中首先追溯府州縣官祭祀藥王起自元代的三皇廟，明洪武時確立為伏羲、神農、軒轅三氏，但洪武 4 年（1371）即下詔郡縣藥王只可祭祀韋慈藏，清代繼承此制，康熙 57 年（1718）就在臺灣建立藥王廟。蔣氏在說明此次自己參與修廟的理由時，不僅提出祀典上的根據，更以「父母官」的姿態，從醫學和風水的角度詮釋守土者在臺灣祭祀藥王有調護民氣、減少疾病的必要性：

⁵³ 〈重修藥王廟碑記〉，此碑現仍存於藥王廟後壁。拓本參見何培夫主編、孫德彪監修，《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篇》，下冊，頁 455。

⁵⁴ 臺灣寺廟常見為建廟、修廟有功者（功德主）立長生祿位的現象。

予讀地志，臺灣四時之氣闢多於翁，故其民元府常開，腠理不掩，漸染成疾，往往為風淫，然則調護之功尤資神保佑哉！以享以祀，不可緩已，爰擇地西定坊，撤舊制廓而新之。蓋民猶子也，父母於子陰陽六氣稍有違和，必為之種福田、求利益，俾我子孫逢吉而後已。⁵⁵

從道光 18 年的碑，也可以看到藥王廟最初自稱「我北勢街」、「本境人等」，但是在道光年間參與重修的群體除了「本境人等」外，還加入了「各郊舖」，後者可能就是乾、嘉年間所形成以水仙宮為中心，以「郊」為名的一群商人。⁵⁶

乾隆 29 年臺灣知府蔣允焄不僅支持藥王廟的重建，也積極介入水仙宮前的清拆工作。蔣允焄〈水仙宮清界碑記〉言：

水仙之祀，不知所昉，祠官闕焉。獨濱海間，漁莊蟹舍、番航賈舶崇奉之，然其說杳幻，假借附會，殆如騷所稱東君河伯湘夫人流亞歟？郡西定坊，康熙五十四年建廟，志稱壯麗工巧，甲他祠宇，蓋有其舉之，莫敢廢矣。廟前舊有小港，通潮汐，滌邪穢，居民便之，亦神所藉以棲託。歲久汙塞，市廛雜沓，交相逼處，遂侵官道，非所以奉神，即非所以奠民。甲申歲〔按：乾隆 29 年〕，予諭左右居民撤除之。自祠前達小港，計袤共一十二丈，廣共三丈，氣局軒敞，廟貌莊嚴。繼自今父老子弟操盃酒豚蹄走祠下者，可無時怨時恫之虞矣。⁵⁷

此碑上除了蔣允焄的文字外，後半部則刻了水仙宮的支持者對此事的感想：

神以庇人，人以祀神，神人所親，惟德惟馨。緣水仙宮歷年多，施澤久；廟稍荒，而神像剝。癸未冬〔按：乾隆 28 年〕，北郊列號起而繪藻粧飾之，計費金六百大員，視舊有加矣。然宮前庭址遽為市廛凌侵，而利涉通津幾

⁵⁵ 蔣允焄，〈改建藥王廟碑記〉，收於蔣允焄，《東瀛紀典》，頁 51-52b。

⁵⁶ 臺南的三郊以「北郊」最早出現，其後於乾隆、嘉慶之際形成三郊共同聯名出現的現象，顯示臺南郊商大約在此時陸續整合為三郊。參見林玉茹，〈政治、族群與貿易：十八世紀海商團體郊在臺灣的出現〉，《國史館館刊》（臺北）62（2019 年 12 月），頁 1-3、5-51。

⁵⁷ 〈水仙宮清界碑記〉，此碑現在水仙宮內。拓本參見何培夫主編、孫德彪監修，《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下冊，頁 4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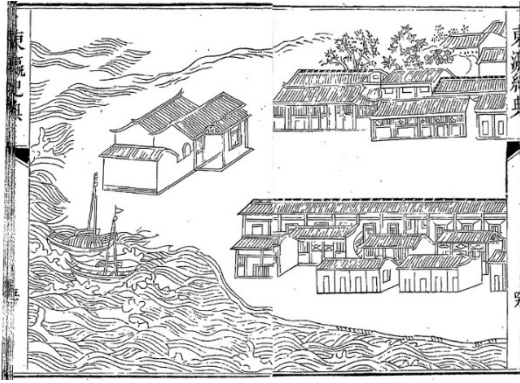
變桑田，周道盡力之功，誰其尸之？我思憲大老爺蔣，蒞政之暇，肅命清故址，除荒穢。歷歲填積，一朝煥然。非公之至德及人，孰能拔其本而濬其源哉！既誌公德以崇神庥，謹附於後，以垂不朽云爾。

北郊商民蘇萬利等，徐寧盛、新泉源、黃駿發、泉裕、德盛、徐德順、泉德、黃六吉，董事呂寶善、林大欽、李殿輔、林起珍、李朝璣、陳行忠、侯錫璠，住持僧克宣同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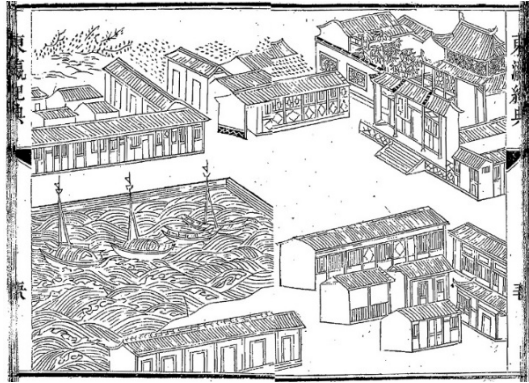
水仙宮的支持者，顯然就是以北郊蘇萬利為首的一群商人，也就是藥王廟所指的「郊舖民」。水仙宮的郊舖商人對於有人侵佔廟前土地與港道完全束手無策，非得借助官方的力量才有辦法趕走對方。「市廛」意指市中的商店，亦指商店雲集之地，水仙宮前被趕走的並非乞丐、羅漢腳之流，而是也依賴宮前港口營生的攤商與居民。⁵⁸ 我們大概可以想像，乾隆年間「坐鎮海口」的水仙宮前，必定是各路商人必爭之地，尤其在乾隆 49 年（1784）開放鹿仔港為臺灣第二個正口之前，府城西門內外的市街與港道絕對是全臺灣最繁忙活絡的商業地帶。蔣允焄此時介入水仙宮前的清拆，目的是維護這個府城重要港口的秩序；而北郊商人在水仙宮立下此碑，更是要給讀者一個官府支持郊民利益的印象，北郊的預設觀者，就是那群被趕走的非「郊」商民。（圖十一、圖十二）

在城西港口商業社會相當緊張的時期，蔣允焄在協助水仙宮之際，同時促成藥王廟建廟的舉動，因此更加耐人尋味。他雖然協助郊商清拆宮前的店舖，但也透過支持藥王信仰安撫了郊商之外的街民，使港口複雜的社會勢力可能維持某種程度的平衡。往後的北郊以水仙宮為據點繼續壯大，發展成三郊，在十九世紀積極參與了府城大部分的商業利益與社會活動，道光 18 年藥王廟的重建，顯示街民在與郊商集團合作的同時，仍清楚的意識到自己「本境」的獨立性。水仙宮與藥王廟之間的歷史，是郊商與城西其他港口群體關係的縮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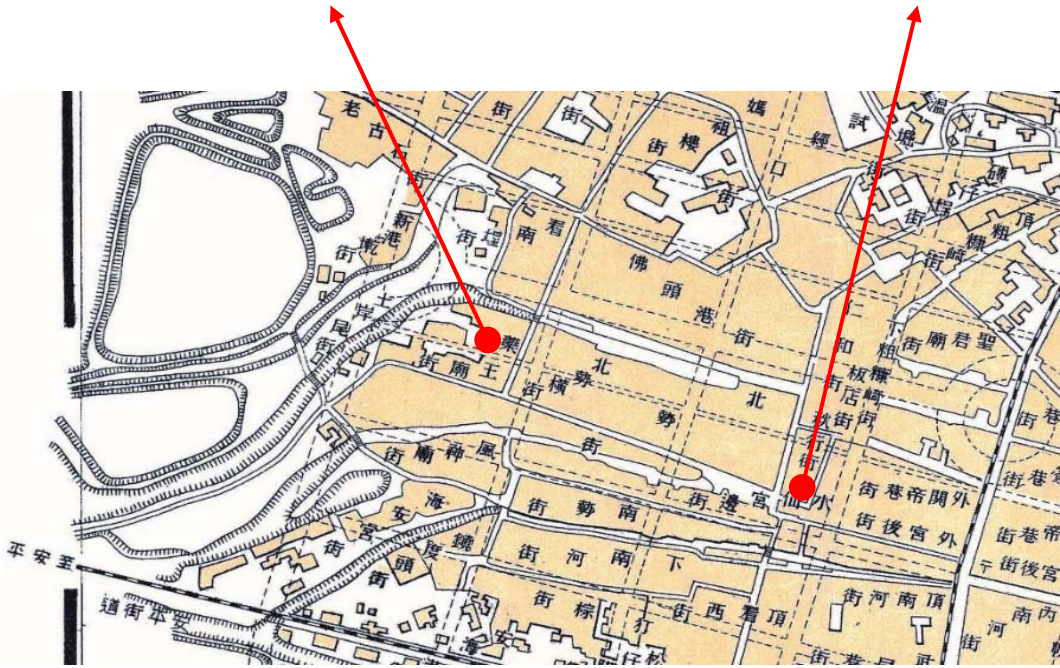
⁵⁸ 有關〈水仙宮清界碑記〉所反映的地方社群與信仰活動的分析，鄭振滿有非常精彩的研究。參見鄭振滿，〈民間信仰與祀典制度〉，收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著，《海洋古都：府城文明之形塑學術論文集》（新北：稻鄉出版社，2012），頁 45-81。



圖十一 蔣允焄〈藥王廟圖〉



圖十二 蔣允焄〈水僊(仙)宮圖〉



圖十三 〈臺南市街圖〉(臺南：黑田書店，1915) 局部

說明：把蔣允焄的〈藥王廟圖〉和〈水仙宮圖〉並排起來看，正好可以呈現雙方位於北勢街一頭一尾的情況，其緊鄰的港道為南勢港。

資料來源：底圖翻攝自賴志彰、魏德文編，《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圖 VI.3.9。箭頭與標籤為筆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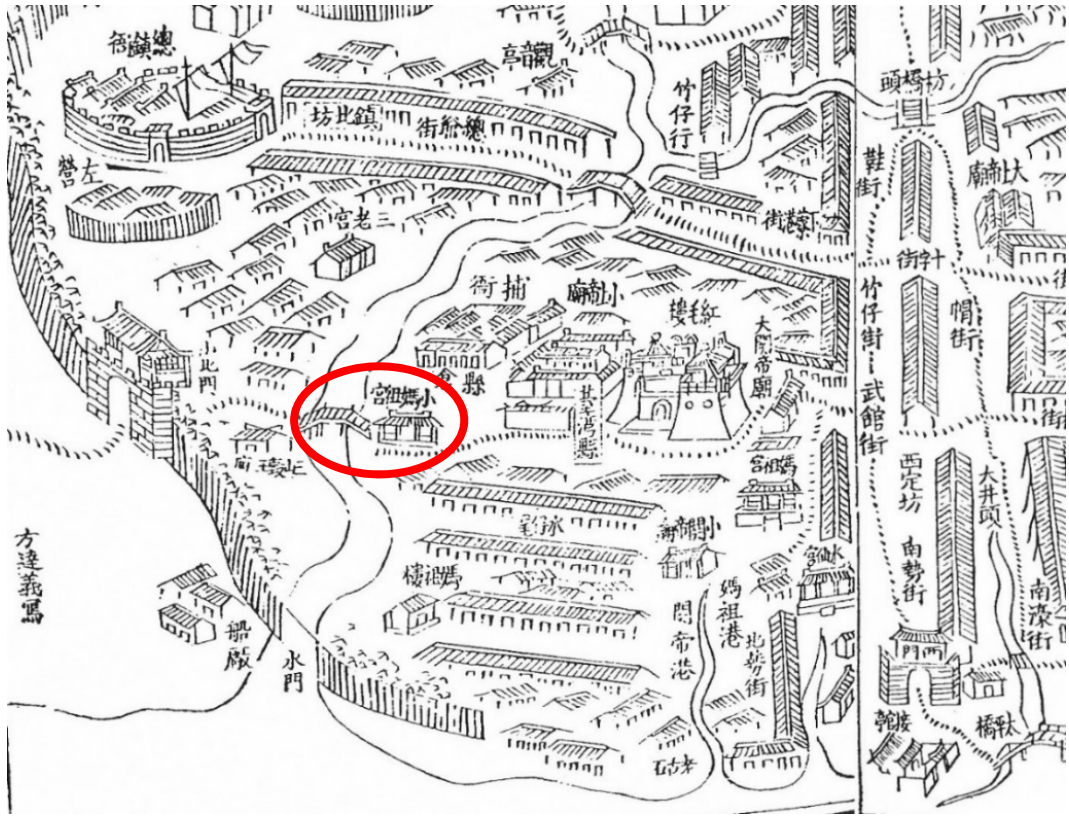
(二) 規制建築

蔣允焄在臺灣知府任內，除專注於官祀建設外，尚有幾項政績涉及水利交通與基層社區，如鎮北坊天后廟（小媽祖宮）、德安橋、南湖、蘊岸橋等，特別是在府城西部地區，從事後地方人士的碑刻來看，蔣允焄與當地居民紳商有許多互動。十八世紀是府城西側港口地區社會與經濟皆高度發展的時期，陸地亦呈現向西擴張的趨勢，不只是蔣允焄，乾隆時期府城官員對城西社會的經營，始終高於城內其他地區。除了積極介入港口社會勢力的平衡外，也關心府城西北軍工道廠、知縣衙門周遭的社區。這個地方北邊與總鎮衙門及左營等軍隊勢力為鄰，西邊為修造水師戰船的軍工廠，西南鄰港口商業區，介於軍營與商業地帶之間的區域，在乾隆 15 年（1750）後新增了知縣衙門。這個區域同時也是通往臺灣北路交通要道，從西門進來的人員及貨品可以通過人為的橋樑穿越此區，經過水仔尾、小媽祖宮，跨過德慶溪，出府城小北門則可前往北部的諸羅、彰化等地。（圖十四）

1. 鎮北坊天后廟與德安橋

府城內有一條由東向西的水道「德慶溪」，發源自城外舊萬壽宮附近，穿越東城牆，流經知府衙門北側、觀音亭之南、縣署、小媽祖宮（鎮北坊天后廟）之北，在船廠南邊的水門流出府城。德慶溪流經的地方由於地勢較低，又稱為「坑仔底」。

德慶溪是地下水湧出切割古臺南沙丘地形而成的溪流，沒有航運之利，但對城內交通造成阻礙，往往要架橋而行，也造成城內的人文景觀的區隔。溪北以總鎮署、中營、左營、城守營等營盤組成，為綠營官兵的活動範圍；溪南則包含了商業市街、行政機構及學校。隨著乾隆時期城西商業活動的擴展，面對府城港口與臺灣北路之間越來越繁忙的陸路交通需求，在城內通往小北門的南北通路「大銃街」上，跨過德慶溪的需求變得十分頻繁且重要。橫跨坑仔底大銃街的德安橋（也稱坑仔底橋）初建於乾隆 12 年（1747），乾隆 25 年重修，乾隆 30 年蔣允焄因護理臺灣道，必須管理橋西北的軍工道（船）廠，又再次倡修，此次修橋的董事之一，就是北郊蘇萬利。蔣允焄同時也修了德安橋旁的小媽祖宮（即鎮北坊天后廟），留下〈重修鎮北坊天后廟碑記〉。（位置參見圖六、圖十四）



圖十四 乾隆《重修臺灣縣志》臺灣府城西北部

說明：圖左為北。紅圈處為小媽祖宮（鎮北坊天后廟）和德安橋。右下角府城的大西門與左側府城小北門之間的區域，有通往府城以北的交通要道大統街（今自強街），但也由於左上方的總鎮衙門、軍營和左下方的船廠，有許多軍人在此生活。

資料來源：魯鼎梅修、王必昌纂，《重修臺灣縣志》，卷首，城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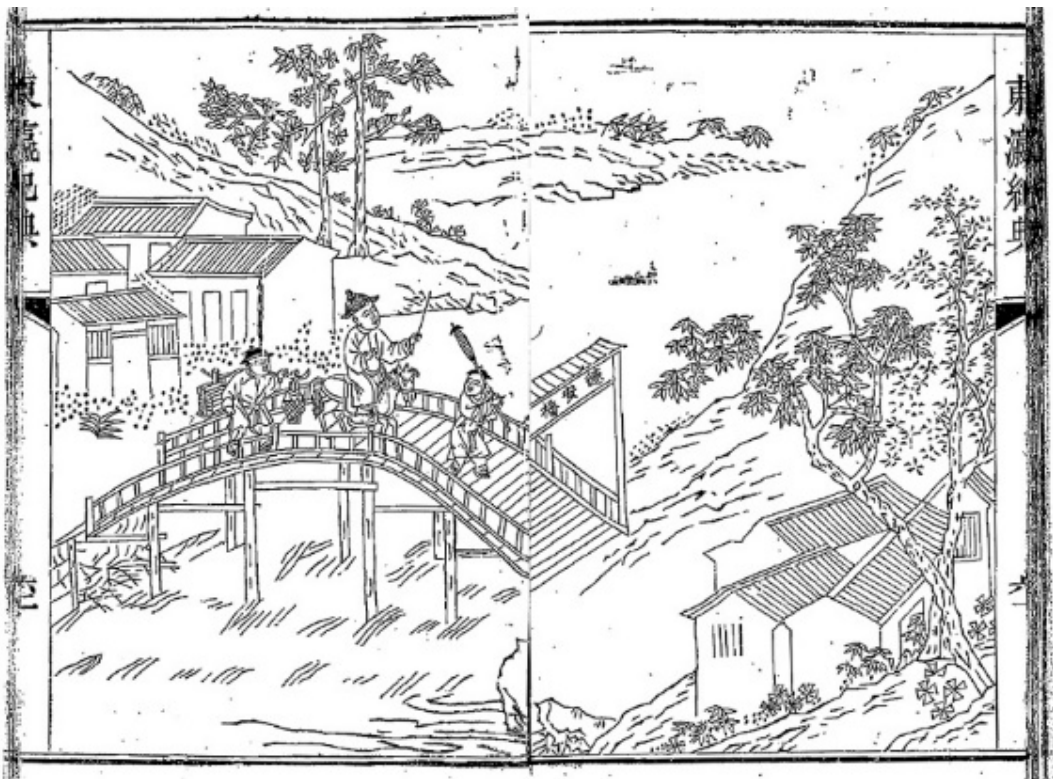
小媽祖宮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很早，現在又名「開基天后宮」，顧名思義，當地人認為這間廟是府城最早的媽祖廟，康熙末年修纂的《臺灣縣志》即言「小媽祖宮，開闢後，鄉人同建，在水仔尾。」⁵⁹ 小媽祖宮被康熙末年的縣志記錄下來，反映該廟在當時的臺灣縣具有特別的意義，但是從蔣允焄的碑記可知，到了乾隆時代小媽祖宮已經「杳若無靈」，除了官祀西定坊天后宮外，當時船廠、磚仔橋這些近海邊的媽祖廟都比小媽祖宮繁盛「巍煥」。小媽祖宮的沒落恰恰說明了土地向西擴張的過程，其實小媽祖宮最初也靠海，但隨著海岸西遷及城牆的圍築而沒

⁵⁹ 王禮主修、王志楨點校，《臺灣縣志》，卷9雜記志，頁272。

落；比小媽祖宮更西邊的船廠和磚仔橋⁶⁰一帶則是新興的聚落，因此能蓋出漂亮的媽祖廟。蔣允焄修建小媽祖宮，可能顯示他也接受小媽祖宮是臺灣天后信仰「始祖」的說法，不獨厚官祀的天后宮。⁶¹

2. 水利設施

蔣允焄做了不少有關水利的工程，如重修德安橋、整治法華寺前的南湖、洲仔尾塹岸橋。除了在府城內外處理水利之外，臺灣中部濁水溪流域的施厝圳也曾留下蔣允焄的〈阻滯圳道示禁碑〉。⁶² 蔣允焄之所以成就此事，是因為他有位擅



圖十五 蔣允焄〈德安橋圖〉

⁶⁰ 船廠即軍工船廠，位於今臺南市立人國小；磚仔橋又名莊雅橋，位於今臺南市府前路與中正路之間的永福路上。

⁶¹ 蔣允焄，〈重修鎮北坊天后廟碑記〉，收於蔣允焄，《東瀛紀典》，頁33a-34b。

⁶² 蔣允焄（示禁），〈阻滯圳道示禁碑〉（乾隆30年），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文叢第151種，1962），頁70-72。

長水利工程的同僚——典史虞好善。虞好善在乾隆 28 年任臺灣縣典史，29 年署竹塹巡檢。⁶³ 蔣氏言此人「曾於山左〔按：山東〕任河渠工，諳蓄洩事」，將南湖疏浚整治的工程全部交付給他。在濱鄰河海，沙磧浮鬆之地，「挖之不深，則水圩沙壅，淹為平原；挖之過深，則土岸單薄，易就坍塌，皆非所以計久遠耳。」虞好善則提出以木樁或種植臺地盛產的蒜茶（林投）樹穩固土岸之法，此法也應用到時常坍方的洲仔尾塹岸橋（以竹障其兩旁，植基孔固）。⁶⁴

在圖像的表達上，有意思的是〈德安橋圖〉與〈塹岸橋圖〉是《東瀛紀典》中唯二有「人」的圖。前者橋上有一行三人，居中者騎馬，前後各有一隨從，一人拿傘、一人扛著像是書的行李，可能是士人或官員出門。後者展現塹岸上、橋



圖十六 蔣允焄〈塹岸橋圖〉

⁶³ 虞好善，順天大興吏員出身。參見謝金鑾、鄭兼才總纂，黃美娥點校，《續修臺灣縣志》，卷 2 政志，頁 205；鄭鵬雲、曾逢辰編，《新竹縣志初稿》（文叢第 61 種，1959），卷 4，頁 141。

⁶⁴ 〈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新建塹岸橋碑記〉，收於蔣允焄，《東瀛紀典》，頁 64-65、72。

上、路邊的旅店都有各式行旅，有人走路、有人乘轎，旅店外的馬匹則暗示店裡喝茶的人是騎馬的。畫面中總共 11 人，每個裝束、姿態、動作都不同，有老有少，展現塹岸橋一帶為往來北路之衝衢、交通活絡的景象。(圖十五、圖十六)

3. 官紳遊憩空間

蔣允焄在其知府暨護理臺灣道的任上，也相當積極的經營了自己和文人的遊憩空間，包括位於府城東門外的彌陀寺、南門外的南湖與半月樓、府署鴻指園都是這樣的產物。⁶⁵ 在〈重脩彌陀寺碑記〉，蔣允焄自道此處「竹影參差，蘭影幽邃」，「數輩名賢皆有提咏，是亦海天勝槩也」；在鴻指園，蔣允焄以蘇軾雪泥鴻爪的典故自勉「古人流連景物，偶然寄之，去無所貪，來無所戀」，但是「所謂偶然而留，亦為其可留者耳」，表示其在官署旁「別做堂宇，以為遊觀」的矛盾心情。在〈鴻指園圖〉中，則能見到其題跋中所提到的古榕、深沼、花欄、小亭，以及開宴會的空間，鴻指園左側架設給爬藤植物的棚架，右側建置供眺望的樓閣，考其方位，應該可以眺望西邊的臺江內海，無不展現蔣氏營造園林的巧思。

蔣允焄在南門外法華寺前方疏浚南湖不僅是個水利工程，而是一個區域開發案，呈現地方官員循序漸進取得土地的過程。考察南湖周圍相關的工程時間，首先應該是乾隆 29 年 4 月至 30 年 2 月的法華寺火神廟整修，接著在 3 月至 5 月間新濬南湖，最後才是利用湖泊的條件，在湖旁建置南湖書院之學舍，於法華寺左畔建講堂。蔣氏所言「抵任後二年，得南湖數畝」的經過，隱約透露出他透過整治湖泊，利用新生埔地建置書院和遊憩空間的設計，南湖的空間特質也使〈新建南湖書院碑記〉與〈改建海東書院碑記〉有截然不同的氣氛，比起海東書院強調處理學籍和教育空間的問題，〈南湖書院碑記〉要表達的是在勝景名區讀書遊憩、展拓性靈的期待。

蔣氏在〈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自述：

北岸邇寺前，南岸砌舞榭，東西岸有眺臺、八卦亭、福德祠諸勝。並為輿梁，一以通往來陡門，二以備蓄洩。每歲時麗景，老幼熙皞，予率僚窳浮

⁶⁵ 除了府署鴻指園外，蔣允焄也在道署修築「禔室」，在清代臺灣官紳界有「禔室十三勝」之盛名。《續修臺灣縣志》有抄錄蔣允焄為新築禔室所作的「記」。

小艇，觴詠其中，山光水色，恍然在目，與民樂之，忘其身之在海外也。⁶⁶

這些以文字描述的景象，與〈南湖書院圖〉及〈火神廟圖〉兩圖充分互證互補，呈現湖泊與周圍各項建築的空間關係。

南湖周圍的建設也使得蔣允焄得到「風流太守」之名，自清代以來，就有文人雅士賦詩紀念。如道光 29 年（1849）來臺的劉家謀在《海音詩》提到：

半月池，在小南門外永康里法華寺前；廣可數畝，即南湖也。左受蓬溪，接內山之流；右出大南門，經新昌里蜿蜒入海。蔣金竹太守允焄親濬之，為旱澇蓄洩之資。建半月樓其上，五日觀競渡於此。畫槳錦帆、金罇玉管，極一時之盛；可謂為政風流者矣。今則寒葦荒蛙，蕭然滿目。⁶⁷

本文前言引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之記載，其主旨包括法華寺半月池、蔣太守、觀競渡等，即不脫《海音詩》所描述的內容。日治時期半月樓和風流太守的典故甚至成為當時詩社創作的題材之一。

（三）書院空間

《東瀛紀典》在首篇萬壽宮碑記之後，就安排了兩篇書院碑記，分別是〈改建海東書院碑記〉及〈新建南湖書院碑記〉，從編目順序來說，可以推測書院是蔣允焄相當重視的事業。

書院在中國的歷史悠久，但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其經營管理的辦法均有相當大的差異。⁶⁸ 雍正 11 年（1733）皇帝諭令各省總督巡撫必須在省會設置書院，書院經費由政府支出；乾隆元年皇帝再令書院山長須由督撫學政禮聘，並接受定期考核，⁶⁹ 使書院正式被列入官辦事項。臺灣的海東書院雖不在省會，但康熙 59 年（1720）就是由臺廈道梁文煊創建，乾隆 4 年即開始以府學教授為書院教師，⁷⁰

⁶⁶ 蔣允焄，〈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收於蔣允焄，《東瀛紀典》，頁 65-66。

⁶⁷ 劉家謀，《海音詩》（文叢第 28 種，1958），頁 23。

⁶⁸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⁶⁹ 蔣溥、孫嘉淦等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 70，頁 72a-72b。

⁷⁰ 謝金鑾、鄭兼才總纂，黃美娥點校，《續修臺灣縣志》，卷 3 學志，頁 262。

並在隔年得皇帝諭旨，應比照閩省鰲峰書院，認可其官辦的經營管理模式。⁷¹

由上可知，蔣允焄對書院的重視，有其制度上的因素，包括修建、經費、聘師、招生都是地方官員的責任。除此之外，蔣氏還提到當下改建海東書院有其特別的時代背景。在〈改建海東書院碑記〉中，他提到皇帝正下詔要求臺灣徹底「清籍」，這是「臺學將轉之機，而斯文興起之象也」。⁷² 在此之前，臺灣的學校與科考飽受內地學生冒籍之苦。冒籍意味著有些學生佔用了本地人的學額，但只有考試時才到臺灣，平時不在此讀書。海東書院自創建以來就頻繁遷徙，學無定所，可能就是因為「合法」學生人數不足的緣故，因為此種官辦書院的學生，是選拔自府縣學的本籍學生。蔣氏預期此次清籍，將能剔除可能佔用學額的冒籍人士，落實本地人上學的權益，提升書院的就學率，因而對書院的發展感到大有可為，另外尋地於府學西崎下進行「比舊規加三之二」的改建。在〈海東書院圖〉也可看到，圍牆環繞的建築呼應了碑記提到的講堂、學舍、亭榭、軒檻等空間，展現地方官員銳意打造全新的學校空間，落實本地書院運作的意圖。

乾隆 31 年蔣允焄結束臺灣知府任期時，一群崇文書院生員在曾任臺灣府儒學訓導的山長陳鵬程率領下，為蔣氏立了去思碑，這塊碑現在已不知去向，但戰後黃典權曾抄錄當時可見的殘碑內容於《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碑中敘述蔣氏任知府三年間的政蹟：

公甫下車，興利除弊，有……
 道篆，攝理防憲篆，平斗斛、正錢法以及恤商、賑貧諸善政，……
萬壽宮，整修各廟宇，營建宮廳，無非公之大有造於臺，方諸……
 府治左，諸生親受甄陶，其藻鑑公明，不啻水衡玉尺；且特……
 歲庶正，捐給膏火；細至構文棹舫，不惜捐俸備造。三年中……
 東，新設「南湖」，俾兩書院巍煥壯觀，多士得絃誦其間，皆……⁷³

我們透過《東瀛紀典》所收錄的碑文，了解到其首先根據《清會典》等文獻，在地方如何創造各種為政和行禮的活動「空間」，包括萬壽宮、各寺廟、書院，都

⁷¹ 托津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卷 317，頁 3b-4a。

⁷² 〈改建海東書院碑記〉，收於蔣允焄，《東瀛紀典》，頁 11-12。

⁷³ 陳鵬程等，〈蔣公允焄去思殘碑〉，收於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73-74。

是先扣緊朝廷所規範的制度，為自己的改建與新建製造合理性。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到他將水利、交通、民生、甚至休憩的空間視為地方行政的一環，展現一個地方官到一個新地方如何運用陸續得到的資源，讓自己和百姓過著更好的生活。

五、地方官的空間經營

在中國城市史的研究中，築城的課題是中外學者最初注目的焦點。1980 年前後藍厚理 (Harry J. Lamley)、姜道章、劉淑芬、許雪姬等人先後針對清代臺灣的築城發表研究，為臺灣的城市研究奠定基礎。劉淑芬與許雪姬注意到竹城乃臺灣城牆的一大特色，大部分的城都是以竹城為原型，其後才陸續改建為土城或磚城。⁷⁴ 藍厚理以新竹、宜蘭、臺北為例，關注其築城的時間點分別在移民社會不同的發展階段，並把築城看作是官府與民間勢力交互作用的舞臺，藉以了解傳統中國的築城活動在帝國晚期的邊陲地區有什麼變化。⁷⁵ 姜道章則把清代臺灣的築城分為十八至十九世紀、十九世紀上半葉、十九世紀下半葉等三期，分別代表行政中心地的築城、北部防禦原住民與盜匪的築城，以及漢人移民於平原共同合作的築城，實以築城反映姜氏自身對清代臺灣史發展結構的看法。⁷⁶ 石萬壽也討論臺南的築城，但其由城防的角度切入，使築城的問題可與城內社區網絡的形成聯繫起來。⁷⁷

1970 年代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 結合地理學的中地理論和中國的市場體系所建立的城市階層與區域發展論，深刻的影響了中國的區域研究。在他主持的研討會論文集《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除了施堅雅自己立基於量化統計的城市體系架構外，其他論文則透過分析傳統中國城市的空間、社會組織及以幾個古老城市的發展為個案說明中國城市的特色，前述藍厚理的研究亦是當時的成果

⁷⁴ 劉淑芬，〈清代臺灣的築城〉，《食貨月刊》（臺北）14: 11/12（1985 年 3 月），頁 484-503；許雪姬，〈臺灣竹城的研究〉，收於黃康顯等主編，《近代臺灣的社會發展與民族意識》（香港：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1987），頁 99-120。

⁷⁵ Harry J. Lamley, "The Formation of Cities: Initiative and Motivation in Building Three Walled Cities in Taiwan,"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55-210.

⁷⁶ 姜道章，〈臺灣的古城：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地理學研究》（臺北）1（1966 年 6 月），頁 53-80。

⁷⁷ 石萬壽，〈臺灣府城防務的研究：臺南都市發展史論之一〉（臺南：友寧出版社，1985）。

之一。⁷⁸ 斯波義信則以寧波的研究參與了當時的會議，之後在 2002 年出版一本通論性著作《中国都市史》，其中特別有一節以臺南、臺北和新竹為例談臺灣的都市化。斯波之所以對臺灣的城市有興趣，是因為在中華帝國發展到尾聲階段，臺灣作為新開發地區，正好可觀察到以縣（府）城設置為核心任務的城市從誕生、發展到漢化的過程。在臺南，斯波主要利用遍布市區的寺廟及空間分析，理解城內移民定居、官員建治及社區組織的發展；談到臺北和新竹，則著重土地拓墾到一定規模後，各地產生設置城市的需求，並有不同的築城組織和辦理形式。其問題意識和分析辦法無不展現施堅雅的影響。⁷⁹

斯波對於臺灣城市的觀察，最終要呼應的是清末以來中國「社會民營化」的結論。隨著帝國疆域的逐步往外發展，官員在前線建立中國式的城市行政，到了清末商人勢力膨脹，則由民間社會承擔起部分的市政或公共事務。臺南城市建設主導者由官到民轉變的關鍵時期，就是發生在十八世紀。

儘管 1970 年代中國城市的研究者受到生態學及社會學的影響，一方面把城市當成一種聚落來理解，一方面關心城市的社會組織樣貌。⁸⁰ 但是中國的城市偏偏與西歐中世紀的商業城市不同，具有強烈的由上而下的行政歷史；中國的城市空間是屬於官吏的，無法不談制度和象徵意義。

為了瞭解中國行政城市空間配置的象徵，芮沃壽（Arthur F. Wright）就指出，歷史上中國的行政城市承載了兩套彼此衝突的思想來源，其一，要合乎《周禮·考工記》的記載，其「匠人營國」的段落記載了包括矩形城池、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方格狀道路等「國」中與宮室的設計原則，並經過東漢鄭玄、唐代賈公彥等經學家的注疏，形成一套以天子為核心，強調對稱、齊整的幾何空間。⁸¹ 其二，立基於華中華南地區的統治者，為了適應多水道湖泊、丘陵深谷的地理環境，發展出講求「氣」和陰陽五行的風水理論。⁸² 章生道（Sen-dou Chang）跟著又更具

⁷⁸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⁷⁹ 斯波義信，《中国都市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頁 225-263。

⁸⁰ 斯波義信，《中国都市史》，頁 ii-iii。

⁸¹ 《考工記》是中國行政城市建築最重要的材料，被認為在漢代代替已經亡佚的《冬官》成為《周禮》的最末章。參見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41，頁 34-42。

⁸² Arthur F. Wright, "The Cosmology of the Chinese City,"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33-73.

體地討論傳統中國城市的擇址、範圍、街道設計與水文的關係，講求與環境對話、成本、商業區位和防衛的實用性需求。歷史上城市的發展，現實的考量始終與對古代經典與禮制的追求有著競爭關係。⁸³

如果從有漢人移民算是臺南歷史的開端，十七世紀出現在世界舞臺的臺南，其發展恰恰供我們了解城市邊疆建置化的過程。臺灣府城的前身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建立的普羅民遮市，以碼頭為起點規劃了通往內陸的道路，在道路兩旁形成早期的市街。接著經歷明鄭官兵駐紮約三十年後，進入清朝統治的時代。清領初期的臺灣府官署、官祀、官學建築，大部分是接收「偽時舊宅」繼續沿用，其中只有臺灣府署被記載為原「天興州舊署」，以及「自偽鄭始也，在寧南坊」的郡學宮可以確認是繼承前朝官舍。⁸⁴ 由於所謂「偽時舊宅」不見得是官方的公務性建築，因此不能高估明鄭官員在臺南地區的行政規模及改建程度。在官方建築多是沿用舊有屋舍，亦沒有留下闢建新路和外牆的線索下，清初的臺灣府城顯然不是一個按照《周禮》中國古典規範的計畫型城市，而是將前一個時代發展下來的建物、環境空間進行再利用的結果。

清代的臺南無法按照古代經典實踐其空間規劃，城牆呈現不規則形，官署與官廟散布城中，除了軍營集中在北邊、孔廟和書院等文教機構較集中在南邊之外，並沒有其他區劃規律。在民間市街也不斷自然發展的情況下，官員只能在個別建築或有限的官地中修整建築，使其符合理想的使用機能。蔣允焄和蔣元樞的重修行動都是在這種侷限下完成的。

所謂理想的機能，在府縣城中，即是指行政和典禮的實踐場所。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從祭祀的角度指出中國行政城市除了有城牆和《周禮》所認可的社稷、風雲雷雨、山川、厲等祭壇外，還有許多官員必須定期祭拜的機構（如天后和關帝），王斯福透過地方志觀察到，在這些官方支持的信仰中，自宋代以來，縣級的地方行政城市必定有學宮（文廟）、關帝廟（武廟）與城隍廟，其崇拜的理想方式是按行政層級分配——府有府學，主祭官是知府；縣有縣學，主祭

⁸³ Sen-dou Chang, "The 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75-100.

⁸⁴ 王禮主修、王志楨點校，《臺灣縣志》，卷2 建置志，頁 136-139。

官是知縣——官祀的管理結構嚴格對應著帝國的官僚體系。⁸⁵ 明清時期這些規範除了被朝廷中央編入《清會典》之外，各府縣官員則於地方志的「建置」、「祠廟」、「禮儀」等篇章記錄他們的建設如何因襲古制，營造朝廷命官在執行各種禮儀所需的空間，禮制中的營城手法（如重視五行方位坐向）成為強調服從王權正統的象徵工具。

清領初期的臺灣府還有各外縣官員集中在府城定居、辦公的情況，此種情況到了十八世紀發生了變化。康熙 43 年（1704），原先避居府城辦公的鳳山、諸羅縣官員，被閩浙總督要求「歸治」，回到其縣治所在地執行公務，臺灣一府三縣的地方行政才逐漸邁向正常化。⁸⁶ 原來因陋就簡的府城各官方建築，在陸續改建或新建的情況下（如臺廈道陳瓚改善府縣學宮環境、梁文科新建田祖廟、重建萬壽亭），此時才開始展現行政機關的新氣象。⁸⁷ 雍正 3 年（1725）以後在府治周圍築起城牆，更落實府「城」之名，確立了有形的城市空間範圍。⁸⁸

築城使府城的禮儀空間產生關鍵性的轉變，特別是城門的設立使府城的方向、邊界可以確立下來，而有條件安排需在特定方位的固定性祭壇。例如康熙版《清會典》規定，地方官需每歲致祭無祀鬼神於本城之北郊，⁸⁹ 臺灣府、縣官雖從清初就開始祭厲，但只是在祭期擺上臨時性的神主，祭畢即將神主收起，厲壇要遲至乾隆 15 年才由知縣魯鼎梅建於小北門外。⁹⁰ 臺灣府官員敬拜皇帝舉行慶賀禮的場所，最初設在府學明倫堂，康熙 50 年（1711）由臺廈道陳瓚另擇永康里新建萬壽亭。但是雍正年間的城牆卻把萬壽亭劃在城外，造成出入府城必須考慮

⁸⁵ Stephan Feuchtwang, "School Temple and City God,"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581-608.

⁸⁶ 在康熙時期編纂的《諸羅縣志》和《鳳山縣志》都提到兩縣的行政與軍備都為了康熙 43 年「奉文歸治」而展開移動的情況。參見周鍾瑄纂修，《諸羅縣志》（文叢第 141 種，1962；1724 年原刊），卷 2 規制志，頁 25-26；陳文達纂修，《鳳山縣志》（文叢第 124 種，1961；1720 年原刊），卷 2 規制志，頁 12。

⁸⁷ 王禮主修、王志楨點校，《臺灣縣志》，卷 2 建置志，頁 140-144；田祖廟祭祀神農氏，取其「始為耒耜以教民，而稼穡之事興」之典故，參見王禮主修、王志楨點校，《臺灣縣志》，卷 9 雜記，頁 273。

⁸⁸ 吏部尚書隆科多等，〈為奏臺地建築事〉（雍正 3 年 7 月 10 日），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撰，《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貳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第 10 冊：清雍正 2 年 3 月至 4 年 6 月，頁 288-289。

⁸⁹ 勒德洪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康熙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卷 66，頁 23b-24a。

⁹⁰ 魯鼎梅修、王必昌纂，《重修臺灣縣志》，卷 6 祠宇，頁 126。

城門啟閉的時間，離開府城前往萬壽亭時，城內衙署、倉庫、營盤也需要加以保衛以免唱空城計。位於城外的萬壽亭此時給城內人的感覺是偏僻而遙遠。此後這個位於城外的萬壽亭就被廢棄，又回到府學明倫堂行禮。到了乾隆 30 年，知府蔣允焄乾脆在城內東安坊新建一座萬壽宮，免去進出城門的麻煩。⁹¹ 這反映儀式空間的塑造一方面遷就於外在地緣環境是否成熟（有北門，進而可以定位北郊）；另一方面，也取決於地方官員的個人意志、資金的有無，甚至是來自皇帝的要求。

表三以康熙 23 年（1684）清朝領臺、雍正 3 年臺南築城為分段點，統計 1865 年安平開港以前新建的官方建築，將臺灣府城的官方建設分為三個時期進行比較。A 時期顯示清朝的官署多數沿用清領以前的舊建築。B 時期應特別注意陳瓚的貢獻，陳瓚在康熙 41 年至 43 年（1702-1704）擔任臺灣知縣，康熙 49 年至 54 年（1710-1715）任臺廈道，在臺時間長達 8 年，其任內完成萬壽宮、各壇及府縣學等建設，康熙時期臺灣府的官方儀制空間可說是由陳瓚所完成的。C 時期為築城之後到開港，這段時期除了調整萬壽亭（宮）、臺灣縣署和書院的位置外，還可以注意到蔣允焄以知府護理臺灣道的身分新建各祀典廟的「官廳」。蔣允焄也因此成為陳瓚之後新建官署建築最多的官員，蔣元樞雖然經手的建築也不少，但多是在蔣允焄的基礎上整修，少有新建項目；乾隆末年林爽文事件後楊廷理將府城城牆全面改建為磚石城，並增建西城牆，⁹² 確立了目前我們所認知的府城範圍。開港之後，雖然十九世紀下半葉臺灣政府出現了不少新的「局」、「處」單位，也再次重修了城牆，但幾乎沒有新建的官署建築了。

自陳瓚以降至楊廷理改築城牆期間府城內豐富的官方建設，展現了十八世紀臺灣的官員在這個拓墾前緣的首府城市調度行政資源、主導城市建設、執行帝國制度的能力。表中沒有呈現的是，比起缺乏捐獻者姓名的陳瓚碑記，蔣允焄和蔣元樞的碑記留下了相當多民間捐獻者的名字，越接近十九世紀，民間對公共建設及社會組織的投入有成長的趨勢。從建築使用權的角度來說，十八世紀民間資本開始參與建設，與其說是「民營化」的過程，不如說是從官營走向公共化的過程，特別是官祀廟宇，至少到清朝結束統治之前，這些寺廟仍然發揮政治儀典空間的作用。

⁹¹ 余文儀主修、黃美娥點校，《續修臺灣府志》，卷 7 典禮，頁 435-436。

⁹² 楊廷理，〈改建臺灣府城碑記〉，收於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頁 148-150。

表三 臺灣府城官方建築分期

		A. 清領以前	B. 1684-1724	C. 1725-1865
祀典	萬壽宮		1711◎陳瓚(永康里萬壽亭)	1766★◎蔣允焄(移萬壽宮)
	關帝廟	有		1765★◎蔣允焄(官廳)
	天后宮		1684 施琅改寧靖王府	1765★◎蔣允焄(官廳)
	龍王廟		1716◎梁文科	1765★◎蔣允焄(官廳)
	嶽帝廟	有		
	風神廟			1739◎鄂善
	火神廟		1708◆宋永清	
	田祖廟		1716◎梁文科	
	城隍廟	有(府城隍)	1711◆張宏(縣城隍)	
	壇		1711◎陳瓚(社稷壇、風雲雷雨山川壇) 1727◆張廷琰(先農壇)	1750◆魯鼎梅(厲壇)
其他			1788★楊廷理(旌義祠)	
規制	城池			1725◆周鍾瑄(木城) 1776★蔣元樞(增小西門) 1791★楊廷理(增西城牆)
	衙署	道署、府署(天興州署)、海防廳署、府經歷司署、縣署、縣丞署、典史署	1712◆張宏(縣學署)	1750◆魯鼎梅(移縣署) 1765★蔣允焄(府署鴻指園) 1766★◎蔣允焄(道署視室)
	公館			1766★蔣允焄(府佐屬公館) 1777★◎蔣元樞(移府佐屬公館)
	船廠			1777★◎蔣元樞(軍工廠)
	恤政		1684◆沈朝聘(養濟院)	1747※六十七、范咸(普濟堂)
學校	學校	府學	1684◆沈朝聘(縣學) 1700◎王之麟(府學明倫堂) 1703◆陳瓚(縣學明倫堂) 1712◎陳瓚(朱文公祠) 1715◎陳瓚(文昌閣、名宦祠、鄉賢祠)	
	書院		1704★衛臺揆(崇文書院) 1720◎梁文瑄(海東書院)	1765◎★蔣允焄(南湖書院、移海東書院)
	考棚			1739※單德謨(考棚) 1836◎劉鴻翱(考棚)
總計(項)		8	20	21

說明：主持建設之官員姓名前以各符號對應不同官職。※=御史；◎=道；★=知府；★◎=知府護理臺灣道；◆=知縣。

資料來源：王禮主修、王志楨點校，《臺灣縣志》；魯鼎梅修、王必昌纂，《重修臺灣縣志》；謝金鑾、鄭兼才總纂，黃美城點校，《續修臺灣縣志》。

六、結論

本次筆者在日本東京都立圖書館發現的《東瀛紀典》係乾隆 31 年臺灣知府蔣允焄所作，蔣氏將其任內所執行的工程，分別撰寫碑記、繪圖，集結整理成書籍的形式於臺灣府署刊印。本書做為官員個人的作品，使我們有機會從「府」的行政官僚視角了解他們如何實踐其工作和理念、甚至評價自己的政績。透過本書的目錄結構、所涉及的建設和碑文內容，可觀察到對蔣允焄來說，制度和禮儀是一個行政城市不可或缺的功能，因此地方長官有必要優先修建能夠舉行《清會典》所規範的祀典禮儀，以實踐制度的儀式場域。臺南今日留存的清代古蹟，多數是這類官祀制度遺留下來的空間。過去多半只能透過散落在方志及碑刻的文獻整理出官員在地方上的事蹟，《東瀛紀典》則是官員親自作序、按其理想有系統的編排彙整自己的政績，這本書的出現，在了解地方官對於打造行政城市的架構的想法，是非常具體的佐證。

比蔣允焄稍晚的知府蔣元樞也留下結構相似的《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作為任內政績的圖文記錄，在涉及的建設類型與區域上，蔣允焄則比蔣元樞更專注在府城內部禮儀空間的經營。儘管兩者圖畫風格與視角有所差異，但從形式結構來看，蔣元樞的作品受了蔣允焄《東瀛紀典》相當大的影響。透過兩位蔣姓知府的比較，可以看到儘管蔣元樞參與的建設數量不下於蔣允焄，但其新建工程多是距離府城較遠的設施；乾隆 30 年前後蔣允焄進行的 16 項建設，有半數皆是新建工程，且都位在府城內或緊鄰城市的郊區。蔣允焄注重的建設正如其在《東瀛紀典》序言所示，是以典制類的建築為主，新建天后宮、武廟、龍王廟的「官廳」就是官員致祭的活動空間。從城市內部的空間經營上，蔣允焄的作為也提醒我們，清代中國的城市，雖然有面對社會處理民生和水利交通的面向，但從官員的角度來說，制度與祀典禮儀的展演任務更為重要，這個特性也因為《東瀛紀典》是地方官員以其官職身分整理出版的作品，被突顯了出來。

蔣允焄的臺灣經驗無論在他個人官職生涯或在臺南的城市化過程都具有特殊的意義。乾隆初年蔣氏擔任餘姚知縣時，《餘姚志》尚只能從處理訟案和衙門內的人事管理對他進行評價，但是到他擔任漳州知府及臺灣知府時，則能熟練地以

建設活動整合社會資源，為其地方治理奠定社會基礎。臺灣府城做為中華帝國晚期邊疆城市化的重要案例，十八世紀正是臺南擺脫前一個世紀因陋就簡的狀態，從康熙末期至乾隆中期，臺南作為府城的硬體建設與行政空間，陸續被建立起來，蔣允焄主導的新建數量更是空前的多。在這個商業高度發展以及市街土地向西擴張的時期，蔣允焄的建設也試圖跟當時的社會需求對話，其政績雖以官祀和政典相關建築為主，但我們也看到他主持了水利和橋樑的工程；重修位於府城西部的水仙宮、藥王廟和小媽祖宮，則對應了十八世紀城市向西擴張的趨勢，使活絡的民間商業與交通活動成為地方官僚重要的政經資本。民間投入官員發起的建設工作，可說是體現了清朝中葉以後城市的管理由官營走向公共化的趨勢。

受限於本文主題，有關十八世紀府城官員的財政經濟與資助各工程之民間社會的情況，尚待之後進行討論。蔣允焄事蹟與及著作的探討，相信能更推進我們對十八世紀臺南城市發展過程的認識。

引用書目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0032431。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蔣允焄，《東瀛紀典》(1766)。東京：東京都立圖書館藏。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乾隆朝軍機檔》，編號：008921，「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 (THDL)」，下載日期：2020 年 1 月 16 日，網址：<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

愛如生「中國方志庫」，下載日期：2019 年 4 月 12 日，網址：<http://www.greatman.com.tw/fangchiku.htm>。

王 禮 (主修)、王志楣 (點校)

2005 《臺灣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震邦

2018 〈同樣是循吏，規格大不同：平論陳星聚應有的歷史定位 (上)〉，《中原文獻》(臺北) 50(3): 53-71。

2019 〈同樣是循吏，規格大不同：平論陳星聚應有的歷史定位 (下)〉，《中原文獻》(臺北) 51(1): 22-39。

石萬壽

1985 《臺灣府城防務的研究：臺南都市發展史論之一》。臺南：友寧出版社。

托 津等 (奉敕纂)

1992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嘉慶朝)》。臺北：文海出版社。

1992 《欽定大清會典圖 (嘉慶朝)》。臺北：文海出版社。

佐藤政孝

1998 《東京の近代図書館史》。東京：新風舎。

何培夫 (主編)、林文睿 (監修)

1994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何培夫 (主編)、孫德彪 (監修)

1992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篇》，上、下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余文儀 (主修)、黃美娥 (點校)

2007 《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呂順安 (主編)

1994 《臺南市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李文良

2017 〈清代臺灣方志的分野、山脈書寫與帝國意識形態〉，收於黃永豪、蔡志祥、謝曉輝主編，《邊陲社會與國家建構》，頁 361-391。新北：稻鄉出版社。

周作楫 (修)、蕭瑄等 (纂)

2006 《貴陽府志》。成都：巴蜀書社。

周鍾瑄 (纂修)

1962[1724] 《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庞百騰 (Pong, David) (著)、陈俱 (譯)

2000 《沈葆楨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東京都立日比谷図書館(編)

1971 《特別買上文庫目錄·諸家漢籍》。東京：東京都立日比谷図書館。

林玉茹

2019 〈政治、族群與貿易：十八世紀海商團體郊在臺灣的出現〉，《國史館館刊》(臺北) 62: 1-3、5-51。

林開世

2007 〈方志的呈現與再現：以《噶瑪蘭廳志》為例〉，《新史學》(臺北) 18(2): 1-60。

2007 〈風水作為一種空間的實踐〉，《臺灣人類學刊》(臺北) 5(2): 63-122。

姜道章

1966 〈臺灣的古城：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地理學研究》(臺北) 1: 53-80。

洪健榮

2015 《龍滄渡海：清代臺灣社會的風水習俗》。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7 〈崇德報功與神道設教：清代臺灣方志祀典門類的知識建構〉，《臺灣文獻》(南投) 68(2): 1-58。

范勝雄

1998 〈臺郡三蔣與七寺八廟〉，收於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2》，頁1-18。臺南：臺南市政府。

1998 〈府城地理傳說〉，收於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3》，頁1-18。臺南：臺南市政府。

風塵孤劍客

2003 〈臺灣第一循吏：曹公〉，《南臺文化》(高雄) 9: 19-24。

秦國經(主編)，唐益年、葉秀雲(副主編)

199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2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馬雅貞

2011 〈戰動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臺北) 17: 49-89。

勒德洪等(奉敕纂)

1992 《欽定大清會典(康熙朝)》。臺北：文海出版社。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1982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6、19、23、32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張崑振

2005 〈清代臺灣方志所載官祀建築之時代意義〉，《臺灣文獻》(南投) 56(2): 1-22。

梅韻秋

2016 〈天下名勝的私家化：清代嘉、道年間自傳體紀遊圖譜的興起〉，《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臺北) 41: a13-a14、303-370。

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編)

2008 《清代縉紳錄集成(2)：爵秩全本(乾隆三十三年秋)》。鄭州：大象出版社。

許雪姬

1985 〈二劉之爭與晚清臺灣政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 14: 127-161。

1987 〈臺灣竹城的研究〉，收於黃康顯等主編，《近代臺灣的社會發展與民族意識》，頁99-120。香港：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

連雅堂

1920 《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通史社。

陳文達（纂修）

1961[1720] 《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宗仁

2015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各圖的編次問題〉，《故宮文物月刊》（臺北）387: 64-73。

2016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內容解析〉，收於華林甫、陸文寶主編，《清史地理研究 第二集》，頁 305-3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冠妃

2016 〈從碑亭到鐘鼓樓：談臺南接官亭風神廟石亭的「修復」問題〉，《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臺南）11: 225-235。

陳國瑛等（採集）、王志楣（點校）

2007 《臺灣采訪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傅朝卿

2017 〈從臺灣相關方志與《重修臺灣郡城圖說》探討研究臺灣清代寺廟建築的幾個線索〉，收於傅朝卿，《讀史·寫史·論史：傅朝卿建築史與文化遺產論文選集》，頁 48-71。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彭 萊（撰文）

2006 《界画楼閣：中国山水画通鉴》。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斯波義信

2002 《中国都市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

黃秀政

1986 〈清代臺灣循吏：陳瓚〉，《文史學報》（臺中）16: 117-129。

黃典權

1953 〈由蔣公子說到蔣允焄（上）〉，《臺南文化》（臺南）3(1): 67-71。

1953 〈由蔣公子說到蔣允焄（下）〉，《臺南文化》（臺南）3(2): 65-70。

1966 〈蔣公子研究：臺灣知府蔣元樞治績考〉，收於中國文化學院臺灣研究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文物論集》，頁 121-145。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87 〈三研「蔣公子」〉，《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臺南）13: 83-154。

黃典權（編）

1966 《臺灣南部碑文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撰）

2006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貳輯）》，第 10 冊：清雍正 2 年 3 月至 4 年 6 月。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劉良璧（纂輯）

1961[1740]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劉家謀

1958 《海音詩》，臺灣文獻叢刊第 2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劉淑芬

1985 〈清代臺灣的築城〉，《食貨月刊》（臺北）14(11/12): 484-503。

蔣溥、孫嘉淦等(撰)

1992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臺北：文海出版社。

蔣允焄(示禁)

1962 〈阻滯圳道示禁碑〉(乾隆30年)，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151種，頁70-72。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蔣元樞(原著)，洪安全、林天人(文字撰述)

2007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蔣元樞(原著)、吳幅員(編)

1970[1778]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灣文獻叢刊第28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蔣元樞(原著)、封思毅(編)

1983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鄧洪波

2005 《中國書院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鄭玄(注)、賈公彥(疏)

1983 《周禮注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鄭振滿

2012 〈民間信仰與祀典制度〉，收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著，《海洋古都：府城文明之形塑學術論文集》，頁45-81。新北：稻鄉出版社。

鄭鵬雲、曾逢辰(編)

1959 《新竹縣志初稿》，臺灣文獻叢刊第6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魯鼎梅(修)、王必昌(纂)

2001 《重修臺灣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

盧嘉興

1967 〈夢蝶園與法華寺〉，《臺灣研究彙集》(臺南)3: 1-11。

賴志彰、魏德文(編)

2018 《臺南四百年古地圖集》。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謝金鑾、鄭兼才(總纂)，黃美娥(點校)

2007 《續修臺灣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謝貴文

2005 〈清代鳳山知縣宋永清的政績〉，《高市文獻》(高雄)18(1): 29-39。

2006 〈清代臺灣循吏姚瑩的治安事功〉，《屏東教育大學學報》(屏東)24下: 413-444。

蘇同炳

1996 《劉璈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Chang, Sen-dou 章生道

1977 "The 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75-10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euchtwang, Stephan 王斯福

1977 "School Temple and City God."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581-60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mley, Harry J. 藍厚理

1977 “The Formation of Cities: Initiative and Motivation in Building Three Walled Cities in Taiwan.”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155-21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Arthur F. 芮沃壽

1977 “The Cosmology of the Chinese City.”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33-73.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ity Construction and Its Pictorial Expression: The Case of *The Construction Record of Eastern Overseas* by Taiwan Prefect Jiang Yunxun

Kuan-fei Chen

ABSTRACT

Using the case of the prefectural capital of Taiwa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Qing civil officials designed and set up their workplaces in an administrative city. Besides infrastructural establishments for meeting administrative, defensive, transportation, and economic needs, the most noticeable constructions in the prefectural city are usually official temples, government schools, and city walls, the remains of which constitute the typical impression of present-day Tainan. *The Construction Record of Eastern Overseas* published by Taiwan Prefect Jiang Yunxun in 1766 offers clues to understanding the ideas of local officials and the actions they took to transform a Qing local city into an administrative and ceremonial space.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Jiang Yunxun's official career, the legends and memories regarding him in Tainan, and the book-making process. Reviewing contents of his book and comparing city constructions erected at his initiative would shed light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his contribution to establishing a prefectural cit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as considered crucial to the shaping of the urban landscape of Tainan. Successive Taiwan Prefects Jiang Yunxun and Jiang Yuanshu contributed most to Tainan's city planning. Their constructions also influenced local gentry-merchants and the society. Finally, pictorial gazetteer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Record of Eastern Overseas* reveal how Qing local officials expressed the ideal appearance of official administrative and ceremonial spaces, all of which have contributed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present-day Tainan.

Keywords: Jiang Yunxun, *The Construction Record of Eastern Overseas*, Local Governance, Urban Architecture, Ceremonial Space